

APDQ

Asia & Pacific Defence Quarterly

2014

No.04 (总第2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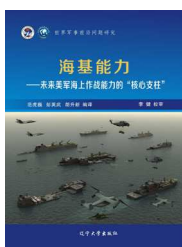
亚太防务

纵观全球



知今鉴远

新书介绍



本书的出版，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对军事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其权威性和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郭慧志

这部书不是一本空洞的理论说教。它以美第5军第3机步师在伊拉克战争头两个月的进攻作战行动为研究对象，详尽地采访、分析和论证了网络中心战略构想以及各种装备和武器，在美军实战中的应用及其效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乔良少将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是一家独立的战略和防务研究机构。研究所立足于防务动态和学术热点的追踪分析，着眼于长远性、战略性问题的深入研究，为国家有关机构及决策者提供独立、客观的战略与政策建议。

研究所自创立以来，本着“独立、客观、慎思、明辨”的宗旨，致力于战略与防务研究，通过学术研讨会、学术刊物等多种形式，为国内外防务/安全专家和机构提供一个国际性交流的平台。目前，研究所已同国内外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业务联系。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总部位于北京，下设战略研究中心、战役战术研究中心、独联体东欧研究中心等相关机构。研究所定期出版包括《知远防务评论》、《网络战》、《独联体东欧防务评论》等在内的多种战略与防务研究期刊；不定期编译出版《知远防务研究系列丛书》和《知远防务研究报告》；连续多年围绕当时的学术热点组织了学术研讨会，在防务学术研究领域享有一定的声誉。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Knowfar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 Defence Studies



联系方式：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59号

创智天地7单元502室

电话：0510-86403040

邮编：214433

网址：<http://www.knowfar.org.cn>

邮箱：knowfar@vip.qq.com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北京分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20号

汇通商务楼44号楼535室

电话：010-66806711、010-68186991

邮编：100036

邮箱：knowfar2009@126.com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天津分部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湖中路滨湖

大厦1108室

电话：022-23539930、23539931

邮编：300060

邮箱：lyddxdgz@sina.com

韩国国防现代化进程 8



今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飙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朝鲜指责在半岛南部举行的“侵略性”军事演习迫使“朝鲜半岛的局势进入了极端危险

的时刻，一场核战争一触即发。”

各种因素交汇在一起将导致朝鲜采取令人难以想象的行动，大韩民国必须保持一种坚定的军事立场来对抗这个危险的政权。

再聚焦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 22

澳大利亚与其相距最近的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跌宕起伏。正式地说来，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1906 年，当时的澳大利亚联邦从英国手中接过了巴布亚领地的管辖权，随后在 1920 年，国际联盟又把前德属新几内亚领地委托给澳大利亚管理。后来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同与日本作战以及 1975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从澳大利亚独立。

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人民关系也联系得非常紧密，并且双方还长期展开防务合作，按常理来推断，两国之间应该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牢固的、持久的关系。

南中国海上空的风暴 37



相互不信任、国际军力加强和竞相宣称领土主权，使中国认为是其内海的重要航道内充满紧张。

在所有可能会引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全面敌对行动的潜在导火索中，最危险的一个会是南中国海的对峙。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这条通道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经济和战略冲突的场所——是一个不明确的地方，充满了误判的可能。

目录 CONTENTS

防务论坛 DEFENCE FORUM

韩国的对外军事技术合作	5
韩国国防现代化进程	8
韩国陆军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13
韩国 T-50“金鹰”超音速教练/轻型攻击机及其市场状况分析	17

战略评述 STRATEGY REVIEW

再聚焦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	22
日本的能源安全挑战	28
中亚地区安全体系构建	34
南中国海上空的风暴	37

作战研究 OPERATIONAL RESEARCH

南亚地区冲突：原因、后果及前景展望	43
澳大利亚战略规划浅析	52

军力透视 FORCE INSIGHTS

澳大利亚“陆地 400”装甲车换装计划的竞争者	56
守护和平之邦的文莱皇家武装部队	60
土耳其强大的国防工业：是北约的后起之秀还是不羁的盟友？	65
位于中美两国利益交叉点上的泰国	70

2014/No. 04 (总第23期)

亚太防务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郭惠志

副 主 任：王建国 范虎巍

委 员：王 成 李延旭 王子敬

严 骁 牟文涛 陈春帝

彭志平 龙梦廷 聂 明

江 明 陈传明 扬 羽

李洪兴 严 美 沐 俭

秘 书 长：金 韬

主 办：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总 编：李 健

副 总 编：殷 华

本期责编：王建国

本期编辑：陈春帝 陈传明

美 编：徐 霞

市场发行：李玉红

地 址：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59号

创智天地7单元502室

北京分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20号

汇通商务楼44号楼535室

电 话：010-66806711、68186991

邮 编：100036

邮 箱：knowfar2009@126.com

网 址：http://www.knowfar.org.cn

(内部刊物)

本刊所选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认同或证实其真实性，请读者自行甄别把握。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公众微信平台，发布最新防务动态，最新研究成果，本所动态要闻等。

南亚地区冲突：原因、后果及前景展望 43

冲突研究是一项宏大的智力工程。201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Pennsylvania)在一项调查中列举了100家顶尖智库，其中有超过60%的智库对冲突及冲突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武装冲突领域，而那些由大国干涉或全球秩序运转的强制性需求引发的冲突只是偶尔或偶然得到了人们的关注。随着“阿拉伯之春”现象向其他地区蔓延以及人们更频繁的在联合国框架内以行使“保护之责”(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形式实施干涉(正像我们在利比亚看到的或有可能在叙利亚看到的那样)，对冲突进行研究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热点。不过，在研究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全球政治条件”所发挥的作用。

澳大利亚“陆地400”装甲车换装计划的竞争者 56



澳大利亚政府即将关于其雄心勃勃的“陆地400”(Land 400)项目做出决定，该项目旨在更换陆军大部分现有装甲车辆。该项目的合同总值高达100亿澳元，它是澳大利亚陆军迄今为止最昂贵、最复杂的装备采购计划。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宣称，“陆地400”项目在采购成本以及对陆军的作战能力影响方面，是“最有效的赋能项目”之一。

位于中美两国利益交叉点上的泰国 70



尽管泰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但它长期以来是一个战略利己主义者。美国空军和泰国的接触时间很长久，但有时也会碰到很多麻烦。从正面来看，泰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向美国作战飞机开放了很多空军基地，其中7个基地美国至今仍然可以使用。此外，曼谷是“金色眼镜蛇”和“天虎”年度军事演习的举办地，这些演习让美国空中、地面和海上力量在泰国与亚洲各国的同行们齐聚一堂。

韩国的对外军事技术合作

[知远导读]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外国军事评论》杂志 2014 年第 2 期，作者 A·莫罗佐夫，原文标题：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文章介绍了韩国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基本原则和与主要伙伴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情况。

为了给本国武装力量装备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加强国防科研技术实力，增加国产军用新产品的出口，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与外国的军事技术合作。

韩国领导层认为，军事技术政策的基本原则是：

- 发展和支持本国国防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 在解决为本国武装力量采购武器装备的问题时，优先采用“效费比”标准；
- 在能够与现有系统充分整合

和兼容的情况下采购最高效的武器装备；

- 完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立法，简化军事采购程序，并确保程序透明；

- 改革参与对外军事技术合作的机构和组织，提高干部职业水平。

国防部军事采购计划局、军事科学研究所和军品质量监督局是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国家对外军事技术合作计划的主要机关。大型合同须由总统办公厅批准。

双边政府间协议是韩国对外军

事技术合作的基础。1965 年签订的条约和 1996 年签订的国防技术领域合作备忘录对在该领域与美国的关系做出了规定。1989-1998 年，韩国与意大利、法国、泰国、菲律宾、英国、加拿大、波兰、以色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荷兰、德国、罗马尼亚、新西兰陆续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韩国与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有科技情报交流协议，与美国、英国、德国有军事产品价格数据交流协议。

目前韩国军事工业能满足本国武装力量 85% 的需求, 因此花费大量资金购买外国武器装备。

美国是韩国的主要军事技术合作伙伴, 韩国约 80% 的进口装备来自美国(双边军事技术合作规模超过 250 亿美元)。同时, 首尔十分重视采购航空技术装备、导弹和非制导火箭武器、无线电电子设备及其生产技术。

例如, 根据 2008 年签订的协议, 波音公司于 2012 年向韩国交付了 21 架 F-15K 战斗机(项目总额约 24 亿美元)。此外, 2012 年该公司向韩国交付了以波音 737-300 为原型改装的 4 架预警机, 总额约 16 亿美元。上述技术装备的雷达设备和其他一些无线电电子设备由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在波音公司的监督下生产。

韩国与雷神公司签订的为其海军采购 RAM 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正在履行(3 套共 7 千万美元)。

在美韩在韩国军工企业联合研制生产武器装备的合作框架内, 已经理顺了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T-50 教练机及其改型——FA-50(轻型攻击机)的批量生产。

2012 年, 韩国国防部决定为本国海军购买 8 架美制 MH-60R“海鹰”多用途直升机(西科斯基公司生产)及其动力装置、控制与通信设备、直升机练习器、全套备用工具和附

件。

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为了避免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 首尔正在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同时不仅十分重视采购现代化高技术武器系统, 还十分重视采购国外的先进技术, 以在本国军工企业组织生产。

与德国的合作主要在海军领域进行。首尔正在根据 2009 年签订的协议按许可证建造德国 214 型柴电潜艇。目前韩国海军已装备 3 艘 214 型潜艇。预计到 2015 年之前还将装备 6 艘。

2012 年美方向韩国交付了 48 具“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发射装置和 220 枚防空导弹, 以及展开 2 个防空导弹营(4 个连, 每个连 6 具发射装置)所需的相关设备。合同总额超过 10 亿美元。

韩国在继续采购德国制造的 120 毫米滑膛炮, 用于安装在韩国生产的 K-1 坦克上。德国专家还参与维护和修理以前交付韩国陆军防化分队的放射、化学和生物侦察和洗消、去活设备。

韩国与法国正在为韩国陆军合作研发生产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计划期限到 2020 年以前)。此外, 法国专家正在对韩国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提供技术支持。“三星-泰利斯”联合企业正在研制和生产韩国国产装甲车辆用的武器控制系

统、通信和导航系统, 以及将用于装备未来防空系统的雷达。Sagem 公司正在参与改进韩国现役 209 型柴电潜艇。2012 年, 在潜艇上安装了法国的“西格马 40XP”惯性导航系统。

韩国与英国在海军领域的军事技术合作正在扩大。其中, 韩国正在采购 DSAR-5 搜救潜水器。为海军陆战队采购了 124 辆三星公司与 BAE 系统公司联合研制的 KAAV 水陆装甲输送车, 合同总额 1.6 亿美元。此外, 在继续联合研制无线电电子设备和自动化指挥系统, 并对韩国海军的“大山猫”反潜直升机进行改进。

韩国国防部对发展与以色列的军事技术合作很感兴趣。对于韩方来说, 优先方向是获得反导防御系统和无人机研发技术, 以及联合研发反坦克导弹系统。

其中, 2010 年为韩国反导防御系统从以色列奥尔加系统公司购买的 2 部 EL/M-2080 空天监视雷达已经交付担负战斗值班。尽管雷达价格很高(约 8 千万美元), 特拉维夫提出了 6 千万美元的有利的抵销条件, 包括转让雷达生产和物质技术维护技术同, 以及在设备服役期内在韩国境内生产备件和配件的技术。合同总额为 2 亿美元。

考虑到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开支巨大, 韩国领导人在努力吸

引其他资金投向军工企业。其中，正在采取措施扩大军品出口。同时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出在未来15-20年内使韩国跻身世界主要军火出口国之列（海军装备、教练机、火炮、装甲车辆、监视-测量和辅助设备）。

首尔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扩大军事装备出口规模：对军品出口贸易谈判进行高水平的政治跟踪，为外交人员（包括武官）组织出口政策集训班，积极开展宣传和展览活动。

计划通过提高国防科研效能来实现提出的目标。例如，计划到2015年之前将每年在该领域的开支占军费比重提高到15%（目前约为5%，即16亿美元），占全国两用技术开发拨款比重不低于3%。

韩国军火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到2013年初已达30亿美元。韩国军火的主要进口国是近东和中东、东南亚及拉美国家。

目前KT-1和T-50教练机、“神弓”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装甲车辆和汽车、火炮系统以及轻型护卫舰和快艇都是定位出口的韩国产武器装备。

其中，目前在继续向土耳其交付55架KT-1教练机。此外，2012年11月签订了总额约5亿美元、向秘鲁提供20架KT-1教练机的合同。

计划到今年年底向菲律宾交付12架TA-50轻型攻击机。加上配

套设备和售后服务，项目预算为5.9亿美元。韩国还在与印度、新加坡和泰国商谈出售TA-50事宜。

埃及、印度、哥伦比亚、阿联酋、沙特和土耳其都是韩国产装甲车辆和汽车的潜在买家。

韩国正在对一系列国家开展工作，以期获得K1A1、K-2坦克和K-21步兵战车的订货或签订组织联合生产的协议。

该领域规模最大的合同（4亿美元）是与土耳其签订的。韩国现代罗特姆公司正在帮助后者的专业人员研发新型主战坦克。2012年10月已经交付了试验样车。计划2016年展开批量生产。土耳其武装力量对该型坦克的需求估计为250辆。在总额10亿美元的双边一揽子协议框架内，韩国将向土耳其供应必要的部件用于装备K-9的火炮系统。

韩国自2011年8月起与埃及就以K-9为原型联合研发自行榴弹炮一事进行谈判。

韩国的出口政策也扩展到导弹技术装备。2012年11月韩国LIG NEX1公司和哥伦比亚国防部签订了向后者出售SSM-700K“海星”反舰导弹系统及其导弹的合同。交易总额约为1亿美元。应该指出，这是韩国第一次向外国出售国产精确制导导弹武器。尽管数额不大，但首尔十分重视这份合同，希望未来能接到其他拉美国家的类似订货。

韩国在海军装备领域还在积极推销国产快艇、小吨位战舰、岸基雷达、用于装备和保卫海军基地和船厂的各种设备，以及大修和海军技术装备维护服务。在该领域已经向澳大利亚、孟加拉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菲律宾提出了合作建议。

韩国大宇造船与海事工程公司自2011年12月起为印尼建造2艘德国设计的209型潜艇。这份合同总额估计为11亿美元，计划2018年完工。

必须指出，韩国领导人正在力图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包括乌克兰。例如，2011年在乌克兰国有企业“黎明-机器设计”燃气轮机制造科研生产综合体代表团访问韩国期间，双方讨论了向韩国提供气垫登陆艇用燃气轮机装置及其备件以及燃气轮机装置技术维护和修理的问题。

根据增强国防力和提高本国武装力量作战能力的方针，韩国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同时，国家领导人力求不仅为武装力量装备最新的武器装备，还要从国外购买先进技术，以组织本国生产进而向其他国家出口。

（舒克译自俄罗斯《外国军事评论》杂志2014年第2期，原文作者是A·莫罗佐夫）

韩国国防现代化进程

[知远导读]

印度《亚洲军事评论》2013年第10期发表了戈登·阿瑟的文章: South Korean Defence Modernisation。文章指出,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韩国也正在加快国防现代化的步伐,2013年国防支出达到了破纪录的307亿美元。韩国陆军、海军、空军都进行了大规模现代化升级。文中详细介绍了各军种现代化计划的具体细节。

今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飙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朝鲜指责在半岛南部举行的“侵略性”军事演习迫使“朝鲜半岛的局势进入了极端危险的时刻,一场核战争一触即发。”

各种因素交汇在一起将导致朝鲜采取令人难以想象的行动,大韩民国必须保持一种坚定的军事立场来对抗这个危险的政权。毕竟,平壤政府一贯好战,并且这位年龄仅30岁,缺乏经验的新任领导人似乎有意证明他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官。2012年12月12日,朝鲜发射了一个枚三级“火箭”。2013年2月12日,

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武器试验。联合国的谴责招致朝鲜恼羞成怒,这个无赖国家再次否认了1953年停战协定,关闭了非军事区(DMZ)的热线电话,还威胁把首尔和华盛顿特区变成“火海”,并将对美军在关岛和日本的基地发动袭击。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作为复仇者显然认为这是测试他勇气的适当时机。2013年2月25日,韩国首位女总统举行了就职典礼,而美军正在经受扣押所带来的痛苦。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示弱,将可携带核弹头的波音B-52H“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和攻击型核潜艇

部署到了朝鲜半岛,并承诺加强在韩国、日本和阿拉斯加的反导防御系统。为了缓解韩国的恐惧,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说,美国将继续通过“其核保护框架提供进一步的威慑”。朝鲜的核打击不是主要威胁,但是朝鲜最喜爱的擦边球游戏——小规模挑衅——可能会迅速升级。

这样的阴谋包括2010年3月使用一枚鱼雷袭击了韩国海军的一艘轻型护卫舰,随后在同年11月对韩国延坪岛进行了致命的炮击,这足以证明韩国不能放松警惕,即使是瞬间。这些事件不但使韩国认识到

军队体制的僵化，而且也下定决心加强军队的响应能力。因此，2011年3月，韩国发布了“国防改革307计划”（Defence Reformation Plan 307）。该计划重组了统一的军事指挥，并寻求更尖端的武器装备（例如，预警系统和导弹防御）。韩国制定了新的交战规则，新任国防部长金宽镇（Kim Kwan-jin）向他的国家承诺，如果必要将进行报复性空袭。

根据美韩战略联盟2015年的路线图，2015年12月韩国准备全面接手半岛上所有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OPCON），今年再度紧张的局势对这一计划提出了挑战。战时作战指挥权从2012年开始移交，但上述事件表明韩国军队并没有做好准备。2013年3月22日，美韩两国实施了反挑衅计划，但是双方都没有透露其内容，驻韩美军评论说，“完整的计划包括磋商程序和打击行动，确保美韩两国联合对朝鲜的挑衅做出有力、果断的响应。”

2005年，韩国发布了“防务改革2020”（Defence Reform 2020）计划，这是一份军队全面现代化计划。它承诺在超过12年的时间内提供1500亿美元，但因为资金短缺，该计划许多项目无法落实。然而，2010年的挑衅事件促进了国防预算的增长，2013年国防支出达到了307亿美元的顶峰。虽然朝鲜在

威胁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崛起的军事态势也使韩国不得不保持警惕。

导弹防御系统

由于朝鲜不断扩大其导弹库，韩国需要一种远程打击能力。去年10月，美国终于同意其盟友可以发展一种射程达431海里（800千米）的中程弹道导弹。韩国已经有了一个主动导弹发展计划，从2009年开始部署射程为269海里500千米“玄武-2B”型巡航导弹。

韩国的巡航导弹资产包括：韩国LIG Nex1公司生产的陆基“玄武-3A”型（射程431海里/800千米）巡航导弹；“玄武-3B”型（射程539nm/1,000千米）巡航导弹。据报道，国防部今年已经开始装备射程809海里（1500千米）涡扇发动机提供动力的“玄武-3C”型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其弹头重约450千克（990磅），可以覆盖朝鲜全境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玄武-3C”型巡航导弹在能力上与“战斧”（Tomahawk）巡航导弹类似，可以陆基发射、空基发射或者舰射。据报道，在今年已经形成作战能力的超音速舰射“海生”II型（HaesongII）巡航导弹的射程也达到了431海里。

韩国一直抵制美国要求其加入区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

压力。相反，自2006年以来，韩国已发展了韩国版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KAMD），预计将于2015年完成。关键组件包括装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宙斯盾”作战管理系统（CMS）的KDX-III级驱逐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埃尔塔系统（Elta Systems）公司合作研制的EL/M-2080“超级绿松”Block B型早期预警雷达；雷神公司生产的MIM-104“爱国者”（Patriot）地对空导弹（SAMS）。空中和导弹防御单元指挥网络集成了所有要素，2013年7月开始投入使用。此外，国防部正在寻求在2016年为其KDX-III驱逐舰装备雷神公司生产的增程型RIM-174标准主动制导地对空导弹。韩国还装备了48枚从德国购买的老式MIM-104D“爱国者先进能力-2”制导增强型导弹火力单元，4月份，国防部批准一项计划将这48枚导弹升级到MIM-104F“先进能力-3”标准，以便提高该系统的拦截率。

韩国版防空导弹系统将会陆续投入使用。俄罗斯的阿尔马兹设计局（Almaz Design Bureau）帮助三星泰利斯公司开发的射程为22海里（40千米）的中程KM-SAM型（也被称为Cheongung）地对空导弹将在今年开始取代雷神公司生产的MIM-23“霍克”地对空导弹。改进后的Cheolmae4-H型拦截导弹具备高层能力，射程约81海里（150千

米)。另外,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关于出售“铁穹”地对空导弹系统举行了高级会谈,但没有实质性进展。

韩国武装部队总员额大约 64 万人,到了 2020 年,总员额将下降到 51.7 万人。该国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兵,但是明年,服役期将从 24 个月缩短至 18 个月。

陆军

自 1953 年韩国和朝鲜之间停火以来,韩国陆军(RO'KA)的职责几乎没有改变,那就是击退朝鲜大规模地面入侵。但是,它正在通过复杂的新型装备加强自己的实力。装甲部队主要依靠 1,500 辆 K1 和 K1A1 主战坦克(MBT)以及现代罗特姆公司(Rotem Hyundai)等待生产的、新的 55 吨 K2 主战坦克。韩国希望采购 397 辆 K2 主战坦克,但它们价格昂贵,这要归功于其强大的能力,K2 主战坦克装备了 120 毫米(4.6 英寸) L/55 主炮、炮弹主动装填装置、导弹袭击警报系统、战场管理系统和主动防护系统(APS)。K2 主战坦克入役时间已被推迟到 2014 年 3 月,这主要是因为集成斗山集团(Doosan) DST 公司的 1500 马力发动机和韩国 S&T Dynamics 公司自动变速器造成的困扰。韩国官员承认,前 100 辆 K2 主战坦克将使用进口的 MTU-890 发

动机和 RENK 变速器。

韩国陆军将其 47 个步兵师至少削减了 20 个,但未削减的部队加强了现代化建设。K21 型步兵战车于 2009 年开始列装陆军部队,根据初始订单要求,韩国陆军正在从斗山集团 DST 公司采购 466 辆该型战车。2012 年 11 月,韩国选择了现代罗特姆公司作为采购 600 辆轮式装甲运兵车的首选竞购方,确保其陆军具备美国“斯瑞克”旅类似的步兵机动性。现代罗特姆公司将基于现有 KW1/KW2 型战车提供六轮驱动和八轮驱动两种原型车,并在 2016 年至 2020 年之间开始生产。韩国陆军需要超过 1,100 门 K9 自行榴弹炮来抵消朝鲜在火炮数量上的优势,目前已经有几百门入役。韩国开发的射程达到 43 海里(80 千米)的多管火箭炮原型预计今年完工。

陆军航空兵也正在提高。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KAI)生产的 245 架韩国版“完美雄鹰”(KUH-1, Surion)通用直升机中的第一批 10 架直升机已经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交付陆军航空学校。这种直升机重 8 吨,主要装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其设计得到了欧洲直升机公司的帮助,将取代“贝尔”UH-1H 中型多用途直升机的各种任务。韩国陆军航空兵还将采购高达 270 架国产轻型攻击直升机用于取代 MD 直

升机公司的 500MD 和贝尔 AH-1S“眼镜蛇”直升机,韩国版攻击直升机(KAH)是一种与外国伙伴合作开发以降低成本的最大起飞重量小于 5 吨的平台,研发时间为 2013 年至 2018 年。这将为韩国陆军采购重型攻击直升机实现高低搭配的直升机群开辟了道路。2016 年至 2018 年,国防部将接收 36 架波音 AH-64E 第 3 批次“长弓阿帕奇”(Apache Longbow)直升机。韩国也有积极的无人机(UAV)计划。

韩国 LIG Nex1 公司开发的反坦克导弹系统——中程步兵导弹(MRIM)——将在 2015 年加入部队服役。2011 年,韩国订购了拉斐尔“长钉”(Spike)非视距导弹保卫黄海岛屿,但直到 2013 年 3 月这些导弹才进行部署。

空军

2008 年制定的“新一代主力战斗机第二阶段项目”(F-X Phase II programme)在原先采购 40 架的基础上,又为韩国空军(ROKAF)提供了 21 架波音 F-15K“猛击鹰”(Slam Eagle)战机。2012 年 4 月,61 架 F-15K“猛击鹰”战机交付完毕。现在的重点是第三阶段项目,这也是韩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武器进口订单,从 2016 年至 2021 年,韩国将采购 60 架新型战机取代老式的麦道公司生产的 F-4D/E 和 F-5A/B 战

斗机。三家竞争者分别是 F-15SE“沉默鹰”(Silent Eagle),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A“闪电 II”联合攻击战斗机和欧洲“台风”(Typhoon) 战斗机, 因为三家公司的报价都高于韩国的上限, 2013 年 7 月 2 日开始新一轮招标。

同时, 韩国正在开发下一代隐形战斗机, 以取代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F-16C/D 机群。印尼承担了 20% 的研发成本并将采购 50 架 KF-X 战斗机, 而韩国将采购 200 架。至目前为止, 按照比例制造的模型已经展出, 这是一种 4 代半战机, 其设计比 F-16C 战斗机更先进, 但比不上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技术开发阶段在 2012 年 12 月结束, 但工程设计和制造阶段已被推迟了 18 个月, 因为韩国新的行政管理部需要评估 KF-X 战斗机的可行性。

去年, 韩国选择了 BAE 系统公司作为首选竞标人升级其 134 架 F-16C/D 战斗机。2013 年 4 月, 韩国选择为 F-16C/D 战斗机安装雷神主动电子扫描阵列(AESA) 先进作战雷达。第一批 10 部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套件将在 2016 年交付。因为美国拒绝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AGM-158 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6 月份, 韩国国防部证实将采购德国“金牛座”KEPD350 导弹作为 F-15K 战机的防区外导弹。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

T-50“金鹰”教练机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案例。50 架 T-50 初级教练机正在服役, 22 架 TA-50 轻型攻击平台尚在订单阶段。韩国空军在 2012 年订购了 20 架 FA-50 轻型战斗机改进型, 该机装备了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埃尔塔系统公司联合研制的 EL/M-2032 雷达以及用于飞行员作战转换的 Link 16 数据链终端, 进一步数量不明的订单在 2013 年 5 月签署。2011 年, 印尼订购了 16 架 T-50“金鹰”教练机, 菲律宾计划订购 12 架 FA-50 轻型战斗机。

韩国订购了 4 架波音 737“和平之眼”(Peace Eye) 预警飞机, 其中第一架已经在 2011 年开始服役,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集成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L 波段多用途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在未来的 3 架飞机

上。去年最后两架预警机加入部队服役。2011 年 12 月, 国防部宣布, 韩国正在采购 2 架达索公司生产的“猎鹰 2000”飞机, 该机装备了电子情报(ELINT) 设备, 将在 2017 年列装部队。韩国订购的 4 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C-130J“大力神”运输机将在 2014 年交付, 而专用的空中加油机的采购将被推迟到 2014 年。竞争者可能会是波音公司的 KC-767 空中加油机和空中客车公司的军用 A330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MRTT)。

韩国一直在考虑采购 4 架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RQ-4“全球鹰”(Global Hawk)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但去年的报价快速增长到 12 亿美元后, 情况有所变化。政府已经推迟至少一年时间来做出决定, 并已调查替代机型, 例如, 美国加



州环境航空(AeroVironment)公司制造的“全球观测者”(Global Observer)和波音公司的“幻影眼”(Phantom Eye)无人机。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和埃尔比特公司也正在各自推荐他们的“苍鹭”TP(Heron TP)无人机和“爱马仕”1500(Hermes1500)无人机。

海军

截止到2020年,发展蓝水能力是韩国海军的优先级任务,3艘新投产的驱逐舰有助于这一愿望的实现。

韩国海军最先进的战舰“世宗大王”号(ROKS Sejong the Great)驱逐舰,在最近的夏威夷附近海域试验中测试了其作战系统,该系统表现近乎“完美”,在测试中发射了SM-2导弹。现代重工公司(HHI, Hyundai Heavy Industries)建造的二艘排水量8500吨、配备SPY-1D(v)雷达的KD-3型“宙斯盾”(Aegis)驱逐舰已经服役,第三艘已经于3月24日下水。此外,韩国海军计划从2019年起,要装备6艘5600吨级配备了“宙斯盾”作战管理系统的KDX-IIA级驱逐舰。这些驱逐舰将加强6艘现役的4500吨级KD-2型驱逐舰。

多达24艘“仁川”级(Inchon-class)护卫舰正在取代旧的“蔚山”级(Ulsan-class)和“浦项”

级(Pohang-class)护卫舰。第一艘2300吨级隐身护卫舰在2013年1月加入部队服役,第一批6艘隐身护卫舰将在2015年完工。随着在2007年排水量14000吨的“独岛级”(Dokdo-class)两栖攻击舰(LPH)列装,韩国海军的力量投送能力已经形成。第二艘两栖攻击舰将在2018年完成。韩进重工业公司还制造了4艘4500吨级坦克登陆舰(LST)。

“金雕”(Gumdoksuri)级PKG-A高速导弹攻击艇是一种新的巡逻艇。18艘500吨级PKG-A型装备反舰导弹的高速导弹攻击艇计划用于保卫北方限界(NLL),其中的9艘已经如期加入海军服役。第二阶段将提供200吨级的PKG-B型高速导弹巡逻艇,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向外界披露。

韩国海军还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潜艇发展计划。第一阶段涉及9艘许可生产的209型常规潜艇。在接下来的步骤中,2000年,海军订购了3艘1,860吨级的214型潜艇,2007年,海军订购了6艘配备“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AIP)的214型潜艇。首艘将由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公司(DSME)组装。西门子公司(Siemens)生产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 fuel cells)为潜艇时长两周的水下续航提供动力。同时,韩国正在努力寻求装备不依赖

空气推进系统的3000吨级KSS-III潜艇,该艇将携带“玄武3”型巡航导弹。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公司在2012年12月获得了2艘船的建造合同,然而该计划的发展已经受阻,9艘该型潜艇中第一艘直到2022年才有望交付。韩国将在2015年建立一个新的潜艇指挥中心,并在济州岛兴建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可以直接介入中国东海。

2013年1月,斯塔-韦斯特兰公司的AW159“野猫”直升机收到了首批出口订单,韩国海军要求采购8架直升机。第一批4架直升机将在2015年交付,第二批4架直升机将在次年交付完毕。8架由前美国工艺升级改造而成的P-3CK巡逻机正在加入现有的八架P-3C“猎户座”(Orion)海上巡逻机群(由L3和大韩航空进行了升级)。

除了这些军力的扩充,韩国还获得美国在其领土上保持28,500人的军事存在以及双方经常进行双边演习的承诺。通过特别措施协定(SMc),韩国每年支付7.75亿美元以分担美国驻扎在半岛的军费开支,尽管在目前的谈判中,美国敦促韩国要承担一半的财政负担。

(吴新建译自印度《亚洲军事评论》2013年第10期,原文作者是戈登·阿瑟)

韩国陆军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知远导读]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外国军事评论》杂志 2012 年第 5 期，原文标题：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Сухопутных войс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作者：А·莫罗佐夫。文章介绍了韩国陆军当前任务、部队编成与实力、人员补充与训练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形势与任务

韩国军事政治领导人根据二十一世纪国防构想，认为军事建设的主要方向是建设一支能够在朝鲜半岛和整个东亚多变的军事政治形势中确保国家安全、不仅能够抗击潜在敌人的突然袭击、而且还能予以坚决抵抗和打击的紧凑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考虑到对韩国所面临的当前威胁和潜在威胁的性质的评估，韩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军事危险的主要来源和主要的不稳定因素。

首尔认为，在朝鲜半岛出现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军事冲突的特点是双方都使用战场全纵深杀伤武器，为实现目标而采取决定性行动。同时，韩国军队认为，陆军在冲突

中将发挥主要作用。

根据韩国军事政治领导人现有的学说性观点，陆军的任务是，遂行作战行动，抗击潜在敌人的对本国领土的侵略，并在必要时与其他军种一起独立或在多国部队编成中共同行动。

因此韩国陆军被赋予以下任务：

- 采取进攻性作战行动，以歼灭敌军集团，占领其领土；
- 采取防御性作战行动，以守卫既占地区和领土，对敌人的进攻集团进行最大限度的打击，为后续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 参加海上作战和空降作战；
- 与潜入本国境内的敌特种作战部队作战；
- 消除自然灾害后果。

编成与实力

陆军包括：步兵，坦克部队，导弹部队和分队，炮兵，特种作战部队，防空部队，陆军航空兵，工程兵，化学部队和通信部队，以及后勤保障机构、兵团和部队，军事警察。

步兵是构成诸兵种合成军团、兵团和部队的主要兵种，包括野战集团军、陆军军和机械化军。

坦克部队和分队包括军属独立坦克旅、军属和集团军属独立坦克营、步兵师和机械化师的坦克营及坦克连。

导弹部队和分队包括装备 ATACMS、“玄武”战役－战术导弹的和“欧内斯特·约翰”战术导弹的独立导弹营，装备“奈基－KM”战役－战术导弹的导弹连，均归导

弹司令部指挥。

炮兵包括集团军编成中的炮兵旅、步兵师和机械化师的炮兵团(旅)，装备105、155和203.2毫米牵引式榴弹炮的独立炮兵营，步兵师的炮兵大队(团)。

特种部队包括特种作战司令部编成中的空降旅和独立特种大队，以及后方防御司令部、陆军军和机械化军编成中的特种旅(团)。

防空部队包括首都司令部独立高炮大队，军属和集团军属独立高炮营，步兵师(常备师、动员师和地方师)和机械化师(团)的防空分队。

陆军航空兵包括陆军航空兵司令部编成中的陆航旅和独立陆航营，后方司令部编成中的陆航大队以及步兵师的陆航连。

后勤保障机构、兵团和部队包括陆军后勤司令部、后勤保障司令部、陆军军、师和独立坦克旅的后勤保障分队。

军事警察包括集团军、陆军军和师编成中的独立营和连。

陆军部队由陆军司令(同时兼任参谋长)指挥。陆军编成：参谋部，第1和第3野战集团军，后方防御司令部，9个司令部，8个军，17个步兵师，6个机械化师，7个独立特种空降旅，2个特种旅，27个基干步兵师。

集团军和后方防御司令部是陆

军最高作战军团，其兵力和战斗编成取决于所担负的任务。1个野战集团军可能包括5个军，1-2个步兵机械化师，1-2个高炮营，1个陆航旅，1-2个后勤保障司令部，1个通信旅，1个警卫团和工程兵-工兵部队。

陆军(机械化)军是诸兵种战役-战术军团，可能包括3-4个常备师(步兵师、机械化师)，3个缩编步兵师，4个旅(坦克旅、步兵旅、炮兵旅、工程兵旅)，1个特种团，2个高炮营，8-10个营(坦克营、警卫营、通信营、1-2个炮兵工程营、1-2个汽车营、军事警察营，化学防护营、后勤保障营)，保障和服务部队。

步兵师是战术兵团，包括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3个营(侦察营、工兵营、通信营)，1个坦克营或坦克连，4个连(“陶”式反坦克导弹连、装甲输送车连、化学防护连、司令部连)，保障和服务分队。

机械化师是战术兵团，包括3个机械化旅，1个炮兵旅，4个营(侦察营、通信营、工程兵-工兵营、训练营)，1个司令部连，1个防化连和后勤保障分队。

司令部是陆军战役军团，包括部队、机关和各种保障部门。根据不同的任务，司令部分为：

- 首都司令部，位于首尔，负责首都地区的防御。通常包括：3

个地方步兵师，2个动员步兵师，1个独立高炮大队，1个工程兵大队，若干独立化学营和工兵营，1个军事警察营。

- 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在敌人境内或后方采取破坏-侦察行动，包括：7个空降旅，1个独立特种大队，2个独立营(特种营和通信营)。此外，陆军情报司令部编成中的侦察大队在作战上归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

- 导弹司令部，位于鸡龙市，负责对敌人的军事指挥机关、陆军集团和远程火炮射击阵地进行导弹打击。包括：3个ATACMC战役-战术导弹营，1个“玄武”战役-战术导弹营，1个“奈基-KM”战役-战术导弹连，2个“欧内斯特·约翰”战术导弹营。

- 陆军航空兵作战司令部，位于仁川，任务是在各种战斗中对陆军兵团、部队和分队提供火力支援，为空降兵空降提供保障，遂行侦察，炮火校射，输送部队和技术兵器。编成包括：2个陆航旅，1个独立陆航营，1个空降突击营。

- 情报司令部，位于首尔，负责搜集、处理和分析敌军情报。编成包括：1个无线电和无线电技术侦察旅，4个侦察支队(作战上归第1和第3集团军指挥)，6个独立侦察大队，1个特种支队，3个训练中心和1个特种通信支队。

• 炮兵工程司令部，位于釜山，负责组织陆军炮兵工程保障。其编成中包括修理部队和分队，炮兵器材和弹药仓库。

• 干部训练与建设司令部，就陆军兵团、部队和分队的组织编制，新的作战行动遂行方式和方法，各司令部、兵团、部队战役和战斗训练大纲，院校干部培训等问题制定建议，组织出版条令、教范和教科书。

• 训练司令部，位于光州，负责军人和下级指挥人员的初级训练，民间高校预备役军官训练班毕业人员、陆军军官晋升前的补充训练，领导各训练中心。该司令部下辖1个训练团（包括坦克营和步兵营，训练保障分队）。

• 后勤司令部，负责后勤保障。编成中包括补给基地（粮食和物资器材仓库），燃滑油料仓库，修理基地。

陆军兵团和部队按战备程度分为常备和基干兵团与部队。前者隶属于第1和第3集团军（沿非军事区部署）。这些部队都100%满员。后者包括动员步兵师和地方步兵师，用于提高陆军动员准备程度。

动员步兵师是基干兵团，在和平时期武器装备补充率为80%，人员补充率为10-15%。动员展开后成为步兵师并用于执行步兵师的使命任务。

地方步兵师在和平时期枪炮武器的补充率为50-60%，人员补充率为10-15%。这些师的任务主要是海岸地区及其常驻地各种设施、交通的警戒和防御。

陆军的驻扎决定于国家的地缘政治位置、地形条件和目前民族分离的政治现实。陆军的主力集中部署于南北朝鲜停火线以南、250公里长、4公里宽的前沿地带。非军事区警戒与保护任务基于“首战决胜”战略，该战略是对北朝鲜“先发制人的突然打击”学说的回应。

陆军装备包括：坦克（约2500辆），火炮、火箭炮和迫击炮（超过12000门），反坦克炮（不超过1500门）和防空武器（约2000件），各型装甲战车（2500辆），武装直升机（超过600架）。韩国陆军总兵力约为56万人。

人员补充与训练

陆军补充的法律依据是《兵役法》（1980年）。所有年龄17-50岁的男性均有义务服兵役。年满17岁后他们必须在居住地进行兵役登记，并领取役龄前青年证明。逃避登记者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监禁三年以下）或行政责任（巨额罚金）。每名未服过兵役的人员在19岁时都要进行体检。经体检，通常有约85%的人适合服兵役。其余人员在三年之内可能还要复检。在此期间

他们被禁止出国。

19-31岁的男性义务兵服役期为2年6个月。退役人员或在军事化部队经过军训的18-50岁有服兵役义务者作为预备役。预备役用于补充正规军的兵团和部队，组建新兵团和部队，补充损失，防卫后方地区和执行民防和紧急任务。

根据年龄和训练水平，退役人员和因各种原因不服兵役但在战时适合服兵役的有义务服兵役者被列入一级或二级预备役。

韩国现行陆军补充体制总地说能够保证有计划地为满足动员展开需要而建立必要的、经训练的军事预备役力量。

陆军干部训练在陆军指挥参谋学院、陆军学院、国防大学和民间高校预备役军官训练班、初级专业人员学校、各兵种训练中心、军士训练班（学校）进行。韩国陆军还定期组织军官到外国军校学习。士兵和军士训练大纲包括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陆军有1个基础训练中心、10所学校和训练分队，用于培训初级军事专业人员。每个步兵师和机械化师都有训练营。

为装甲部队、炮兵、工兵和其他分队挑选出来的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在完成初级训练后被派往兵种学校。一共有20所兵种学校，它们对专业人员一共进行200种军事专业的培训。

军士候选人从初级训练过程中的成绩优异者产生，在初级指挥人员学校培训。学制为4-16周（取决于兵种）。军士晋升之前要进行技能提高和补充培训，时间3-12周。

人员训练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韩国士兵加入美国陆军部队：有5-7千名韩国士兵和军士在美国陆军第2步兵师中服役3年。

陆军军官的补充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候选者来自文职人员和军人，应符合教育水平和健康的要求。获得最初的中尉军衔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军事院校或专业训练班的毕业文凭。

现役军人获得军官军衔需要经过短期训练班培训（20周）和专业补充培训。

应该指出，韩国陆军目前正在采取军官连续军事教育原则。据此，军官要在技能提高训练班（初级军官20周）、指挥参谋学院（26-48周）和国防大学（44周）连续学习。军官在晋升更高职务时要进行补充培训（任职培训）。其中，营长和团长参加为期8周的训练班，而师长为1周。

一个广泛采取的做法是，军衔上校以下的军官到外国（美国、英国、中国等）军事院校和民间高校进修学习。

陆军战役和战斗训练的方向是完善在各种防御和进攻行动中指挥

部队的方法，达到高度的战备状态，掌握现代化诸兵种合成战斗技能，使人员具备必要的战术、专业和火力技能。

战役战斗训练依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参谋部每年制定的计划进行。美韩联合司令部负责与美军的联合训练活动。

战役战斗训练的主要形式是集团军、军、师、团和营级首长司令部演习和部队演习（练习），各兵种部队和分队的战术-专业演习（作业），战备检查，各类预备役军人集训班。此外，陆军积极参加国家武装力量和美韩联合部队集团的训练活动。

部队训练的组织原则是提高强度，增加演练任务难度。先在连-营-团级完善野战技能，然后在师和军级进行。所有演习和练习通常在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复杂战斗背景下进行。

韩国陆军认为，平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提高陆军分队和人员战备水平的重要措施。

韩国维和部队是2007年7月首次被派到国外的。这是一个混编营（356名特种部队军人、医护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该营在4年多的时间里执行监督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情况，并对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2011年2月韩国向海地共和国

派遣了240名维和军人。其编成中包括工程建设小组（100人），医疗队（22名军医）和警卫排（18人）。

此外，韩国陆军军人参加了联合国驻格鲁吉亚、利比里亚、阿富汗、苏丹、东帝汶、尼泊尔、印巴边界军事观察员小组。

韩国陆军还参加向阿富汗提供援助的行动。2011年4月在巴格拉姆开设一所医院和一个专业化培训中心，而7月份向阿富汗派遣了320名韩国军人和40名警察，活动至2012年12月31日，每6个月轮换一次。

发展方向

与朝鲜的关系特点和韩国社会的雄心为韩国国防部重新彻底审视对威胁特点、朝鲜半岛潜在武装冲突的原因和特点、陆军的任务和作用及其训练、技术装备和使用的观点创造了前提条件。

2011年韩国领导人决定修改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计划。计划重点放在改革陆军上，确定其主要目标是完善指挥体制，同时提高各军团、兵团和部队的机动性、生存能力和火力。计划将正规部队兵力从现在的56万人裁减至39万人，下级军官数量削减5千人，而军士数量从6万人增加到9万人。

为了增强陆军作战实力，将致力于部队装备性能接近国外最好

产品的新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同时，继续采购 K1A1 坦克、155 毫米 K-9 自行榴弹炮、K-21 步兵战车、“天马”防空导弹系统和“飞虎”高炮、武装直升机和多用途直升机，以及各种无人机。

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始批量生产 K-2 新型主战坦克，在 2020 年之前向部队交付 400 辆，取代老化的 K-1 和 M-48 坦克。在 2015 年之前购买 300 辆新型装甲侦察车和 200 多架国产 KAH 武装直升机和 KUH 多用途直升机，取代 AH-1S 和 500MD 直升机。此外，计划从美国进口超过 30 架 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在提高陆军作战潜力的努力框架内，韩国军事领导人打算积极发展与世界先进军火制造商的军事技术关系，包括美国、以色列—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防公司，以便购买它们的导弹武器系统（战术和战役—战术导弹）、反坦克武器和炮兵侦察雷达。

因此，目前韩国陆军的作战和动员能力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未来其改革计划的实施将促进部队作战实力的增强，更成功地完成其所担负的任务，包括在朝鲜半岛紧张程度可能升级的情况下。

（舒克译自俄罗斯《外国军事评论》杂志 2012 年第 5 期，原文作者是 A·莫罗佐夫）

韩国 T-50 “金鹰” 超音速教练机 / 轻型攻击机及其市场状况分析

〔知远导读〕

韩国开发的 T-50 飞机配备了多种先进设备，性能表现优异，而且既可以充当教练机也可以充当轻型攻击机，因此吸引了不少客户。本文对该机的开发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优势所在进行了介绍，并对该机市场状况进行了分析。

3月28日，菲律宾与韩国签署了一份价值189亿比索（约合4.209亿美元）的合同，购买12架FA-50战机（T-50的发展机型），并由韩方提供训练支持。这是菲律宾耗资850亿比索的军队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此前该国已经购买了8架“贝尔”（Bell）412EP直升机。另外，菲律宾还在求购2艘护卫舰，军方购买6架近距离空中支援（CAS）飞机的请求也已获得批准。

2012年8月，菲律宾空军选中了韩国的“金鹰”（Golden Eagle）战机，此前还考虑过二手的F-16C/D和马基公司Aermacchi M-346。去年10月份，韩国总统朴槿惠与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签署了一份防务协议，该协议对菲律宾购买FA-50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菲律宾开出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之后，首批2架FA-50将交付菲方，用于训练、初始作战测试和评估。首批交付后的第二年，韩国会再交付2架FA-50，最后一批将在2017年交付。

在F-5战机2005年退役后，菲律宾已无战斗机可用，因此需要新的战机来替代这些已退役的战机。F-5退役后，菲律宾空军一直致力于购买用于维护国内安全和反暴乱的直升机和小型飞机。考虑到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端，弥补战斗机方面的空缺对菲律宾而言就尤其迫切了。

2002年8月20日，T-50战机实现了首飞，韩国自此成为了为数不多

的几个具备自主生产超音速飞机能力的国家中的一员。十多年后，韩国获得了第3份T-50战机的出口订单。1992年，三星航天公司(Samsung Aerospace)开始开发当时被称为KTX-2的教练机，目的是弥补韩国空军高级教练机与战斗机之间的空缺，替换空军装备的T-38“禽爪”(Talon)教练机(诺斯罗普公司出品)和A-37“蜻蜓”(Dragonfly)强击机(赛斯纳公司出品)。

这一教练机开发项目共斥资20亿美元，其中的17%来自韩国航天工业公司(Korea Aerospace Industries，该公司于1999年成立，由三星、大宇重工及现代三家公司的航天部门合并而成)，13%来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70%来自韩国政府。韩国政府投资巨大，从而确保了对飞机设计和开发的全面控制并加强本国的航空工业。KF-16“战隼”(Fighting Falcon)战斗机的抵消交易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插手韩国教练机开发项目提供了便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韩国航天工业公司的主要分包商和技术指导，负责T-50机翼、飞行控制系统和航空电子系统的开发以及长期市场营销。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该项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通过T-50与F-16惊人的相似度就可以看出来。尽管T-50机身比F-16短，但该机的操纵面更大，因此更容易控制(特别是在低速飞行的情况下)。另外，T-50的起落架更

大，能够更好地吸收地面冲击力。T-50采用了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生产的配备全权数字引擎控制(Full Authority Digital Engine Control, FADEC)系统的F404复燃发动机，该发动机推力为8045公斤(17700磅)，从而使飞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了1.5马赫，也使T-50成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超音速教练机之一。

T-50弥补了喷气式基础教练机与高性能超音速飞机之间的空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称，T-50是目前唯一一种能够用于第5代战斗机训练的教练机。T-50配备了玻璃座舱、数字式飞行控制系统和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该机座舱的多功能显示器可以根据飞行员的需要进行编程，此外还配有抬头显示器、手置节流阀及操纵杆、夜视兼容设备和头盔显示器。T-50采用英国马丁·贝克(Martin Baker)公司的O/O弹射座椅，且向后倾斜17度，这一点与F-22类似。该机的载荷系数为-3g到+8g，教练机型号的使用寿命为1万小时。

在用于训练任务时，T-50的嵌入式系统会对传感器、威胁、目标、干扰和武器进行模拟。所有的飞行数据、仿真系统和仿真武器的评分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且能够在地面重现。包括电子连接操纵杆在内的各种训练辅助工具能够使教练



图1. 飞行中的T-50

员了解学员的动作并在需要的时候提出建议或纠正学员的动作。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能够对飞机的俯仰、迎角和滚转率进行限制，使学员驾驶 T-50 更为容易。

2003 年，韩国空军下达了生产首批 T-50 的订单。2007 年 2 月，韩国空军的学员班开始使用 T-50。韩国空军共接收了 50 架 T-50，2010 年 5 月接收了其中的最后一架，此时与接收第一架 T-50 的时间间隔还不到 5 年。韩国空军将 T-38 教练机做退役处理，而且在战斗机先导训练时也不再使用 BAE 系统公司的“鹰式”（Hawk）Mk 67 教练机和诺斯罗普公司的 F-5E“虎 2”战斗机，这两种飞机都没有配备 T-50 上配备的数字式显示器和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

韩国光州空军基地（Gwangju Air Base）的两个训练中队（第 189 中队和 203 中队）每年利用 T-50 培训 140 名学员。在这 140 名毕业学员中，有三分之二会去驾驶 KF-16，其余则驾驶 F-5E。T-50 与 KF-16 很相似，因此新飞行员从驾驶 T-50 过渡到驾驶 KF-16 先对比较容易，需要的飞行时间更少。

韩国空军的目标是在训练时仅使用两种教练机（韩国航天工业公司的 KT-1 和 T-50），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使用四种（T-41、T-37、T-38 和“鹰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称，T-50



图 2. 起飞时的 T-50

的训练系统可以使飞行员的训练时间减少五分之一，由于需要出动的架次更少，训练成本可以降低三分之一。全面一体化的 T-50 训练系统包括飞机、地面训练设备（包括模拟器）、电脑教学系统和训练管理系统。韩国飞行员会利用该系统进行大量地面训练，其空中飞行训练的时间与在地面用模拟器进行训练的时间相当。

韩国空军“黑鹰”（Black Eagles）飞行表演队也在使用 T-50。2009 年，“黑鹰”飞行表演队的 6 架 A-37D 换成了 T-50。一开始，“黑鹰”飞行表演队驾驶的是桔黄色和白色涂装的标准型 T-50。现在，“黑鹰”飞行表演队在飞行表演时驾驶的是 8 架 T-50B。韩国专门为“黑鹰”飞行表演队生产了 10 架 T-50B，不

过有 1 架在 2012 年 11 月坠毁了。T-50B 配备发烟系统、外部摄像机和内部摄像机，在挂载的模拟“响尾蛇”导弹（Sidewinder）的翼尖上还装有聚光灯。这种黑、白、黄三色涂装飞机的首次亮相是在 2011 年的表演季上。

2011 年 1 月，韩国航天工业公司推出了 TA-50 先导教练机，该机配备了武器和埃尔塔公司（Elta）的 EUM-2032 多模式脉冲多普勒雷达。除了内装 20mm 机炮外，TA-50 还能挂载 AIM-9“响尾蛇”导弹和“小牛”（Maverick）导弹等导弹。2012 年 6 月，驻地在首尔东南部醴泉空军基地（Yecheon Air Base）的第 16 战斗机联队第 115 飞行训练中队的 22 架 TA-50 全部交付完毕。

在 TA-50 之后，韩国航天工

业公司又开发了专门的轻型攻击机 FA-50，这种飞机加强了韩国空军的 KF-16 并成为了 F-5E 战机的有益补充。FA-50 是具备全面作战能力的 T-50，配备了 Link 16 战术数据链、雷达预警接收器和夜视系统。该机也配备了 EUM-2032 雷达，不过它配备的这种雷达有了多项改进，包括探测距离的延长（100 公里 /60 英里）。FA-50 能够携带总重量近 4700 公斤（10500 磅）的武器，包括 AIM-9L/M/N/P/S“响尾蛇”导弹、GBU-38/B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s）、CBU-105 传感器引爆武器（Sensor Fused Weapon）、Mk 82/Mk 83/Mk 84 和 BLU-109 炸弹、GBU-31/32/38 制导武器以及 LAU-3A 火箭吊舱。

FA-50 的首飞时间是 2011 年 5 月，韩国军事适航认证局

（Korean Military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Authority）在 2012 年 10 月为该机颁发了军用型证书，这是韩国第一种获得此项认证的战斗机类飞机。2012 年 1 月，首尔斥资 6 亿美元订购了 20 架 FA-50。去年 5 月，首尔又斥资 10 亿美元，用于全速率批量生产另外大约 40 架 FA-50。韩国空军倾向于最终订购 150 架 FA-50，这些飞机将用于替代 2019 年退役的约 120 架 F-5E/F。FA-50 已于去年 8 月份开始交付，并且有望在 2016 年实现全面作战部署。

到全面部署时，FA-50 将会部分替代用于对朝鲜大规模老旧战斗机形成威慑的 F-4“幽灵”（Phantom）战斗机、F-5E“虎 2”战斗机、F-15K“冲击鹰”（Slam Eagle）战斗机和 KF-16C/D“战隼”战斗机。在韩国周边，

中国正在开发数种隐身战斗机，日本正在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亚洲国家正在空中力量方面投入巨资。基于这些原因，韩国宣布了采购 F-35 的计划，同时还会订购更多数量的 T/FA-50。

韩国正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国防和航空工业，并希望在 2020 年之前成为全球十大飞机制造国之一。从 2006 年到 2013 年，韩国防务用品出口量增长了 10 倍。韩国航天工业公司是引领这种增长的韩国企业之一，该公司将 KT-1 和 T-50 推向了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T-50 正在与阿莱尼亚·马基公司的 M-346、“鹰式”教练机、沃多乔迪航空公司（Aero Vodochody）的 L-159 以及雅克列夫设计局（Yakovlev）的 Yak-130 竞争。

去年 9 月 11 日，印度尼西亚接收了首批 T-50，韩国从此成为了能够出口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目前共有 6 个国家）。2011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订购了 16 架 T-50（估计耗资约 4 亿美元），用于替换该国空军装备的 13 架老旧“鹰式”Mk53/109。印度尼西亚购买 T-50 还有一个额外好处——T-50 与该国产的 F-16 具有很大程度的共通性。这些 T-50 将装备印度尼西亚空军第 15“台风”中队（驻地在东爪哇的茉莉芬空军基地），用于飞行训练（尽管这些飞机可以进行武



图 3. 静态展示中的 T-50

装)。这些飞机的交付工作已于今年1月份完成,所有飞机在2月份正式移交给了印度尼西亚空军。在这16架T-50中,只有一半采用了迷彩涂装,还有8架采用了蓝黄两色涂装,这也是印度尼西亚“蓝鹰”(Elang Biru)飞行表演队所用飞机的涂装颜色。

交付印度尼西亚的头两架T-50曾在途中在菲律宾和台湾短暂逗留,台湾现役的F-5E/F“虎2”战机大约有60架(将于2019年退役),韩国航天工业公司显然是希望T-50能够成为这些F-5E/F战机的替代品。另外,台湾很快就要寻求用新的教练机来替代其装备的近50架奄奄一息的AIDC AT-3喷气式高级教练机了。

过去几年来,T-50成功地出口到了多个国家。2013年12月12日,伊拉克订购了24架基于FA-50制造的T-50IQ轻型攻击机(耗资11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T-50订单。伊拉克还与韩国签订了一份为期20年的训练与支持合同,加上购买飞机的费用总共达到了20亿美元。这批飞机将于2016年4月开始交付,在12个月内交付完毕。伊拉克空军已经订购了36架F-16战机(首批将于今年开始交付),T-50IQ将用来作为训练F-16驾驶技术的先导教练机。

尽管T-50赢得了伊拉克的订

单,但在新加坡举行的招标中,T-50却败给了M-346。在2013年12月份波兰举行的竞标中,T-50又败给了意大利的飞机。在波兰举行的这次竞标中,T-50的报价最高(5.93亿美元),而“鹰式”教练机的报价为5.77亿美元,M-346的报价为3.84亿美元。2012年和2009年,T-50还分别在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输给了M-346。不过,由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采购半途而废,阿莱尼亚公司没有收到该国的订单,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韩国航天工业公司希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终会选择T-50。

韩国航天工业公司正在积极谋求将T-50销往国外,该公司曾在博茨瓦纳和智利大力推销T-50,并且希望将T-50卖到泰国和秘鲁。去年,有报道称阿塞拜疆对购买T-50产生了兴趣。T-50还将参与美国空军的T-X教练机竞标,以替代其目前使用的T-38“禽爪”教练机。T-38进入美军服役已经超过了40年,其维护费用已经变得很高了。在训练飞行员空中加油、夜间行动和持续作战技能方面,T-38也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韩国航天工业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参与了美国空军这一购买300多架飞机的大项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将会以成为T-38替代品为目标,帮助韩国航天工业公司设计T-50。为

满足美军需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提供不同的航空电子设备和一条美国生产线。由于预算紧缩,美国空军的T-X项目也拖延了下来,预计要到2016年左右需求建议书才会发出,此后再过7年新飞机才会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去年对于T-50来说是个好年头,该机收获了多笔订单,并且生产速度也加快了,达到了平均每月2架,而以前一直都是每月1架(工厂的生产能力为每月2.5架)。韩国航天工业公司的官员称,希望在未来30年内向国外(尤其是东南亚、东欧和美洲国家)销售约1000架FA-50和T-50。T-50被誉为了一种颇具特色的超音速教练机,适合用于第4代和第5代战斗机的训练,同时还是一种价格实惠的轻型战斗机。不过,轻型战斗机的市场空间并不是很大,而且二手F-16和来自俄罗斯公司、中国公司以及欧洲公司的竞争者可能会对T-50进入这一市场进一步造成阻碍。T-50还可能受到美国出口限制的制约,这些限制适用于发动机等物品。不管怎样,韩国航天工业公司有着充足的订单可以使T-50生产线在2017年之前保持忙碌,这段时间足够该公司找到很多其他客户了。

(刘雷译自新加坡《亚洲防务评论》2014年5月号,原文作者是盖伊·马丁)

再聚焦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

[知远导读]

本文简要回顾了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的发展历程，详细阐述了再聚焦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文章把澳大利亚国防军在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作为政府整体工作的一部分，着重审视其如何发挥强大的、持久的和创造性的作用，以更好地维护和强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引言

澳大利亚与其相距最近的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跌宕起伏。正式地说来，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1906 年，当时的澳大利亚联邦从英国手中接过了巴布亚领地的管辖权，随后在 1920 年，国际联盟又把前德属新几内亚领地委托给澳大利亚管理。后来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同与日本作战以及 1975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从澳大利亚独立。

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人民关系也联系得非常紧密，并且双方还长期展开防务合作，按常理来推断，两国之间应该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牢固的、持久的关

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它们的双边关系没有达到理想中的那种亲密程度。

影响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每当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出现纷争时，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会采取所谓的“隔空喊话”外交政策来斥责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且这种情况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尽管澳大利亚的这种斥责肯定是出于善意的目的，但在拥有被殖民历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看来，这样的一种善意表达，常常会被理解为澳大利亚家长式作风的体现。

影响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把国际政策和安全关注的重心转向至遥远的海外。在

2001 年“9·11 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深深地卷入到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中，正是这样的一种军事参与，消耗了澳大利亚国防军（ADF）相当多的精力。虽然澳大利亚国防军肯定没有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代号为“催化剂”、“拖鞋”的海外军事行动之中，但这些军事行动毫无疑问地使得其降低了对我们大多地处南太平洋的近邻（尤其是所罗门群岛所出现的明显异常）的战略关注程度。

随着在 2014 年或者更早的时间内，澳大利亚国防军将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现在到了澳大利亚应重新关注与其周边国家，尤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关系的时候了。为此，本文将着重论述重新关

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的重要性所在，以及在此过程中，应采取何种综合性的方法手段来最为有效地追求澳大利亚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把澳大利亚国防军在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作为政府整体工作的一部分，着重审视其如何发挥强大的、持久的和创造性的作用，以维护和强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为什么要重新聚焦？

尽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时，澳大利亚关闭了在其境内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澳大利亚对这个新成立国家的密切关注。自1975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最大援助国，其所实施的一系列援助项目的总金额约为150亿澳元，就在当下的2012/13财年，澳大利亚政府在其财政预算之内分配用于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金额还高达4.917亿澳元。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每年的双边贸易总额超过了56亿澳元，许多澳大利亚公司，尤其是与自然资源产业相关的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还远不止这些，因为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公民来到澳大利亚工作或求学，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常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生

活和工作的人数也估计在1万人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是实行威斯敏斯特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双方展开军事合作的历史悠久且基础扎实，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曾并肩参与盟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作战行动，等等这些都为深化和密切双边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共同政治遗产。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2009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曾指出，维持周边临近地区安全是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维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类似于这样的观点将很有可能在《2013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中得到重新确立和强化，因为就在最近发布的名为《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的白皮书中，其执行概要部分就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即澳大利亚的未来将不可逆转地与周边各个地区的持久稳定与安全绑在一起。

虽然维持澳大利亚周边地区的安全需要从很多方面来着手，但其中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引起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注意。第一个方面，要在临近澳大利亚的地区内，阻止或削弱任何地区性国家展开持续作战行动的能力。第二个方面，显然与第一个方面息息相关，即帮助澳大利亚的邻国维持稳定、繁荣和团结。之所以单单强调这两个方面，不仅

仅是因为它们地位作用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澳大利亚国防军能为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做出有益的贡献。

虽然澳大利亚国防军展开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无疑会引发巨大的争议，但是就在2012年4月，澳大利亚国防部政务次长——大卫·菲尔参议员所发表的题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维系将来本国繁荣和地区安全》的演讲中，对前段所表述的观点进行了有力重申。在这次演讲中，菲尔参议员还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即如果周边邻国能够保持稳定、繁荣和团结，那么它们将不太容易受到可能对澳大利亚利益怀有敌意的外国势力影响。当然，菲尔参议员的表述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但不管怎么样，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周边邻国保持稳定、团结、繁荣且对澳大利亚持友好态度，那么它们是不太可能会为第三方势力提供在其境内建立或强化军事存在（包括建立、使用海军或其它军事基地的权利）机会的。

有些人可能会对第三方势力在澳大利亚周边邻国谋求军事存在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不太可能。但是，据见诸报道的中国计划表明，中国已经促成了在塞舌尔群岛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未来还有可能会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基地，等等这些迹象都提醒着我们不

能忽视对其可能采取举动的重视。这方面的担忧还不只是局限于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计划，其实早在 1997 年，中国就已经在基里巴斯建立了一个卫星跟踪站，

有消息称这个卫星跟踪站被用于暗中监视美军在马绍尔群岛上的导弹靶场（这个靶场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实施导弹拦截的一个核心所在）。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拓宽一些，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中国在近些年采取包括增加对外援助在内的诸多方法手段，已显著增强了其在南太平洋上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除了要对传统安全领域继续保持关注外，还需要关注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人口、毒品和非法武器走私等。对于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人们普遍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保持稳定、繁荣并且政府治理有方，而不是恰恰与之处于相反的状态，是很难给国际犯罪活动有空子可钻的。因此，鉴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靠近澳大利亚，并且两国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可能（以及事实上）已经成为犯罪活动的温床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很明显地应该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地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发展提供帮助，打造有益于其国家发展的安全环境，以制止跨国犯罪活动增长，清除其滋生土壤。

我们该怎么办？

在评估澳大利亚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稳定、繁荣和团结做出什么贡献时，有一点相当明确，那就是要在政府总体战略和工作的框架下来达成相应的目标。尤其是在当前财政预算现实的条件下，如果政府制定出一整套的问题解决方案，并且加强跨部门之间的合作，不仅能够有效确保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统一和协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相互之间的预算开支，从而为整体工作取得最佳的成本效益提供必要的可能。

从传统意义上讲，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稳定、繁荣和团结提供帮助的主导权，是属于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AusAID）及其前身机构的，这看起来也是符合逻辑和适当的。然而，在澳大利亚政府的一整套援助计划和项目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有着特殊的、悠久的军事合作传统的澳大利亚国防军，能在其中三个关键的“非武力使用”领域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强化关键力量的能力建设、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间社区提供帮助、展开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紧急救援）发挥特殊且重要的作用。

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强化关键力量的能力建设

对澳大利亚国防军而言，要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实现稳定、繁荣

和团结，其所能发挥的潜在（及持续）作用在于加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关部门的合作，以进一步强化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PNGDF）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皇家警察部队（RPNGC）等国家关键力量的能力建设。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国防军所提供的帮助，首要是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军队和警察提高训练水平和职业素质，使其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治理国家的有力工具。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国防军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所提供的这些帮助，还有助于后者强化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更好地保护其所拥有的包括近海资源在内的富饶的自然资源。

澳大利亚国防军所提供的帮助，还能提高巴布亚新几内亚打击跨国和国内犯罪活动的的能力，比如毒品走私、军火走私等。事实上，减少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尤其是山地省份部分地区的非法武器供应，不仅有助于降低这些地区爆发暴力犯罪、部落冲突、民众骚乱的频率，减轻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还有助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皇家警察部队，甚至可以说成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强化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权威。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和皇家警察部队提高能力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助于提高法律的执行力和改善国家内部秩序，为政府能够更好的发挥公共服务（比如医疗、

教育以及选举）职能提供必要的条件。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山地省份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其政府能够提高法律的执行力、改善国家的内部秩序，那么在一定程度也能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当然这些投资者中也包括澳大利亚从事资源开发的公司。这种投资信心的增长所带来的结果，将会从整体上提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从而使得其更加繁荣、团结和稳定。很明显，这不仅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有益，还对澳大利亚有益，双方的经济联系也会因此而更加紧密。其实在这些方面，澳大利亚国防军尤其是陆军早已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比如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展开了一系列的联合军事演习（“全体勇士”演习、“亲密战友勇士”演习、“鳄鱼”演习）。这些演习的科目涵盖非常广泛，其内容甚至包括了一些联合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以及相应的工程合作，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双方的军事交流，提高合作水平和能力。

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实施的《加强合作计划》，也旨在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皇家警察部队提供了与上述类似的帮助，并且此类帮助已在近些年得到恢复和加强。2011年10月，在题为《翻开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的新篇章》的新

闻稿中，吉拉德首相公开宣布要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来深化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其中就有说到“我们已经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展开合作，以把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务合作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她在文中还强调，澳大利亚将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皇家警察部队提供一系列训练与支持的帮助，以增强后者的执法能力，其内容包括把一些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其皇家警察部队中的高级且能发挥战略作用的岗位上任职。

前文所叙述的这些帮助，大多已经得到很好的落实，它们不仅有力促进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和皇家警察部队职业素质、专业能力的提升，同时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实践证明有效且非常重要的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关键力量实施帮助的机制。然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的开展要更经常、更全面，并且最好是建立在澳大利亚国防军广泛参与的基础上。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间社区提供帮助

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澳大利亚国防军可能发挥作用的第二个领域在于，通过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间社区提供帮助，以提高其国

家建设水平。出于这样考虑的原因是，虽然我们为培训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和皇家警察部队提供了帮助，但是这些帮助还不足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社会甚至是政府内，广泛的形成对澳大利亚的良好印象。这同样也指明了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即虽然澳大利亚所提供的一些外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相关部门及职业培训机构中非常受欢迎，那怎么才能够使这些援助在其整个社会内广为人知呢？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特殊原因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85%的人口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他们很少与政府特别是医疗、教育领域的机构和代表接触，并且也很少能接触到媒体宣传与报道。

虽然澳大利亚国防军正在实施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援助项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社区民众对澳大利亚的认知与情感，并且这种好感度的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计能够更好地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但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澳大利亚国防军怎样才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有限的财政预算，以摆脱当前援助项目的束缚，从而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广大的社区提供直接帮助，获取更为广泛的好感？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办法是，采取跨部门联合的方式，直接为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人民提供帮助。采取这种办法还有一个好处，即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达成解决问题的目的，亦有可以借鉴的模式。比如两年前，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防务智囊团合作）组织了一些联合医疗巡诊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央省开展医疗巡诊，其巡诊的区域包括了只能采取乘坐小船或步行的方式才能到达的平时难以进入的地区。

这些联合医疗巡诊队中，名气最大且成效最为显著的是一支在阿巴乌区内的联合医疗巡诊队。它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澳大利亚国防军以及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的人员联合组成，其巡诊活动后来被拍成了名为《阿巴乌区》的纪录片。这支联合医疗巡诊队在为期超过两个星期的巡诊内，为许多村民提供了治疗和药品，受益的村民人数超过 200 人，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医生，并且很多都患有严重的疾病，包括肺结核、疟疾、痢疾、肺炎以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这样的援助活动得到了澳大利亚媒体的高度赞誉，理由当然地也会在得到帮助的民众心目中留下对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国防军的良好印象。这种良好印象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如果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与信赖，将有助于建设

一个更加强大和安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展望未来，采取类似于跨部门联合医疗巡诊方式，在进一步强化澳大利亚国防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甚至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机构间更为广泛的合作方面，能被视为一种成本较低但潜在效力非常明显的方法手段。

展开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紧急救援

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之间，在展开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可能。在这一领域，澳大利亚国防军联合后勤司令部已经与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展开合作，以在其可供支配的预算经费内，探索有助于促进国防部与国际开发署就相关事态展开联合响应的多种方法途径。

其实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国防军已经制定并且实施了一项全面的《防务合作计划》。这项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派遣澳大利亚国防军的相关人员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中担任各种职务，以对后者提供所需要的帮助，这其中就包括了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的军事行动、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提供必要的支持。除此之外，该计划的实施还涉及了定期组织联合军事演习，比如“全体勇士”演习，以及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派遣军事人员来澳大利亚接受个体和集体的军事培训与训练。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人员的个体培训，包括在澳大利亚邓特伦皇家军事学院以及国防学院下属的指挥参谋学院、国防与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对其初级军官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人员的集体培训，包括在汤斯维尔每年组织一次为期一个月左右的“亲密战友勇士”演习，通过该演习为编入澳大利亚陆军第 3 旅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的一个步兵连（人数大约在 100 人左右），提供学习掌握陆军第 3 旅所拥有的作战经验以及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没有的军事设施和装备的训练机会，以提高其整体军事训练水平。

对于澳大利亚国防军而言，适当延长这种联合军事演习的时间，能够增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培养两军人员之间的友谊，亦能够促进相互之间的军事技能交流，这其中就包括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身上学习到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一些极为复杂、艰苦的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经验。上述演习所取得的成效，在代号为“正极”的军事行动——澳大利亚主导的对所罗门群岛的区域援助任务(RAMSI)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这次时间长达数年之久的军事行动中，巴布亚新

几内亚国防军派出了一个排，并且编入到了一个由澳大利亚国防军领导的多国士兵共同组成的连队。

鉴于澳大利亚国防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之间的合作已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亦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尤其是在合作展开训练、维和以及支援国家建设等方面的成效非常明显，诸如组建并维持一支由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联合组成，主要担负西南太平洋地区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紧急援助任务的部队，就可以被视为维持两军更加长久合作关系的一个选项。

一旦“正极”军事行动结束，按照上述编成的一支营级规模部队，将能够成为执行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任务的更为有力的继任者。对于这样的一支部队，我们不应在其性质、任务和编成上过多纠缠，其实组建这样的一支部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就是，把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的一个步兵连编入澳大利亚国防军驻扎在汤斯维尔多个步兵营中的其中一个，在未来西南太平洋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紧急救援事件，也可能是在每年为期6个月的飓风季节中，依据双边区域响应的规定和条款，使用这支部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支援与帮助。当然这样的一支联合部队的使用，很明显的要逐事逐案地征得双方政府同意，并且要在太平洋岛国

论坛的体制下切实行得通，以最大程度的平息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澳大利亚动机的猜疑。

援助资金

当前，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正在整个太平洋地区遍洒援助资金，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不能并且可能也不应该试图与之竞争，尤其是在像斐济这样的一些国家内与之竞争，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早已倾向于从其它国家而不是澳大利亚获得资金援助。

事实上，与相关国家提供的那些动辄总额达数亿美元之多的优惠贷款和用途不明、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相比，澳大利亚要在援助资金方面达到那种程度，在当前财政预算受限的环境下是不太现实的，其原因就包括了澳大利亚已经推迟履行其为达成联合国“千年目标”所做出的承诺，即每年拨出国民总收入的0.5%用于对外援助。鉴于上述情况，澳大利亚亟需一系列创新的合作战略，比如像本文中所建议的那些，以有效应对这一现实挑战。

当然，实施上述创新的合作战略不可能不付出经济成本，尽管采取像联合医疗巡诊这样的援助举措所产生的花费，在澳大利亚当前总额高达4.91亿澳元的对外援助预算面前，其数额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当前澳大利亚与巴布亚

新几内亚业已牢固的国际合作基础之上，采取理性的方法举措加强和深化两国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大有可为的空间，其所产生的效果亦能够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与其它国家提供数额特别巨大的直接资金援助所催生的效果和善意相比肩。

其实澳大利亚打牢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防务合作基础，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好预先准备，并且这种防务合作还将在今后得到继续强化。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已经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宣布在2012/13财年的联邦预算内增加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防务合作预算，数额从先前的1200万澳元增加至如今的2100万澳元。这同时也证明，采取本文所阐述的成本相对较低的方法手段，是澳大利亚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展现“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亦能够使澳大利亚国防军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做出一种非常有益且“非武力使用”的贡献。

结论

强化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关系，绝非是增强澳大利亚在这个邻国所拥有利益的一劳永逸之策。事实上，它只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来源于经济落后的国内问题施加有限的影响。尽管如此，它将使得双方朝互惠互利的目标向前迈进一步，也将为双方展开进一步

的、创造性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合作范围的拓展和合作层次的提高，还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外国势力对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及影响力。澳大利亚需要维持与深化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这种合作关系，以确保澳大利亚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如果我们仅仅只依靠提供永无休止、负担承重的对外援助这一种方法手段，那将会使澳大利亚将该地区的主导权拱手让给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虽然澳大利亚已深深地融入该地区的多边政治和安全体系之中，但增进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双边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维持和强化这种多边政治和安全体系。

澳大利亚国防军作为整个政府体系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发挥非常突出且重要作用的职责。当然，要切实履行好这一职责，澳大利亚国防军需要清晰地认清外部形势变化，以超出历史和当前合作项目的眼光来思考和谋划，从而进一步强化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史上业已牢固的军事合作关系，更好地为维护和增进两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译海译自《澳大利亚防务力量杂志》2013 年第 190 期，原文作者是斯蒂芬·布莱尔）

日本的能源安全挑战

〔知远导读〕

本文对福岛核电事故前后日本整体能源态势进行了细致分析。作者认为：福岛核电站事故让在能源方面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能源挑战。面对能源的短缺，面对民众的反核声浪，日本决策层正在是否放弃核能、是否继续“向内看”上进行着艰难抉择。基于自身的技术和政治优势，日本应把眼光放得更广、更远，更多地“朝外望”，改善与邻国关系，基于整个亚太的能源安全制定能源政策。

困难时期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扭转“向内看”趋势、如龙腾飞、更积极履行国际职责的理想时刻。

——2012 年日本时任外交大臣玄叶光一郎

引言

2011 年 3 月 11 日，一场里氏 9.0 级的大地震席卷了日本东海岸。这场地震和随之而来的大海啸是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自然灾害，共造成了超过 20000 人丧生和约 20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它还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三座反应堆严重熔毁，致使数以万计人口迁移和日本所有核电站停产。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日本仍在是否重新恢复核能最终能源地位的问题上进行着抉择。

这场灾难之前，日本正面临着巨大的能源安全挑战。由于几乎没有本土能源，日本在 2010 年有 96% 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其中近 90%

的石油和 27% 的燃气来自中东。虽然这场灾难之前核能只占了日本全部能源消费的 13%，但它却保障了日本 30% 的电能消费，并计划到 2050 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50%。

福岛核电站的熔毁让日本的长远能源规划陷入了混乱。虽然一直以来日本国内都不乏核能的反对者，而这场灾难却让彻底放弃核能的呼声变得越发强烈。不过放弃核能可能会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能源自给力的下降，并很可能需要重新评定外交政策，特别是在改善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与中国主要讨论的是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的开发事宜，与俄罗斯主要讨论的是进口石油和燃气的事宜）。

日本的能源图

到目前为止，石油仍是日本最大的能源消费，占了总能源供应的近一半（如图1所示）。这个数值在1973年达到了一个峰值——77%。随着日本推出一项多元化能源消费政策，这一数值开始逐渐下降。1973年，天然气只占日本主要能源进口的2%，到了2010年达到了18%。2009年的数据显示，日本每年进口3.84亿吨当量的能源，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大的能源进口国。尽管有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多元化能源消费政策，日本仍然从中东进口了几乎所有能源需求（如图2所示）。

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的电力消费国。就电力生产而言，精炼油的贡献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下降。煤炭、液态天然气（LNG）和核能所占比例大大增加。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向核能研究投入了超过700亿美元。截至福岛核电站事故，其核能发电量位居世界第三。

2011年，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报告，对各种发电方式进行了成本分析（如表1所示）。报告的结论是：核电最为廉价，住宅太阳能最为昂贵（尽管报告也指出到2030年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都可能会显著降低，更具竞争优势）。

日本的长期能源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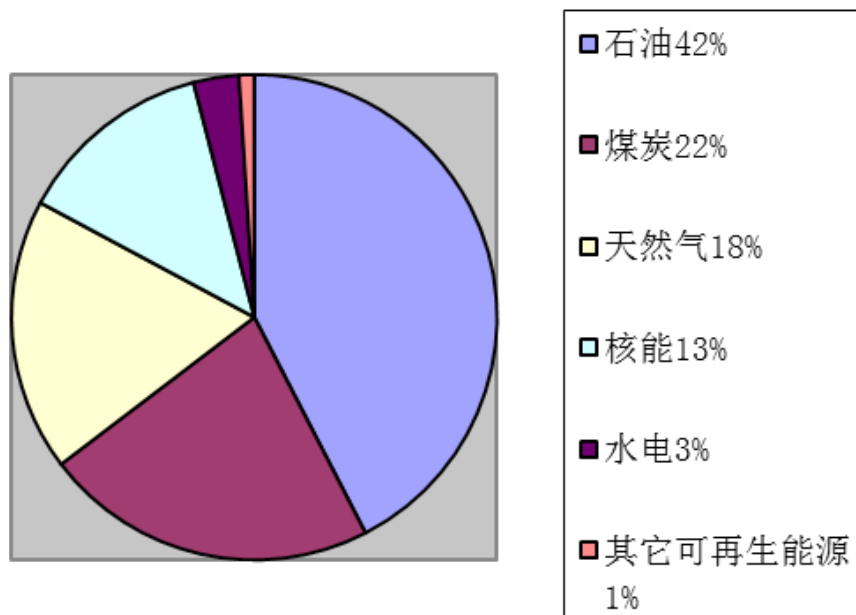


图1. 2010年日本整体能源消费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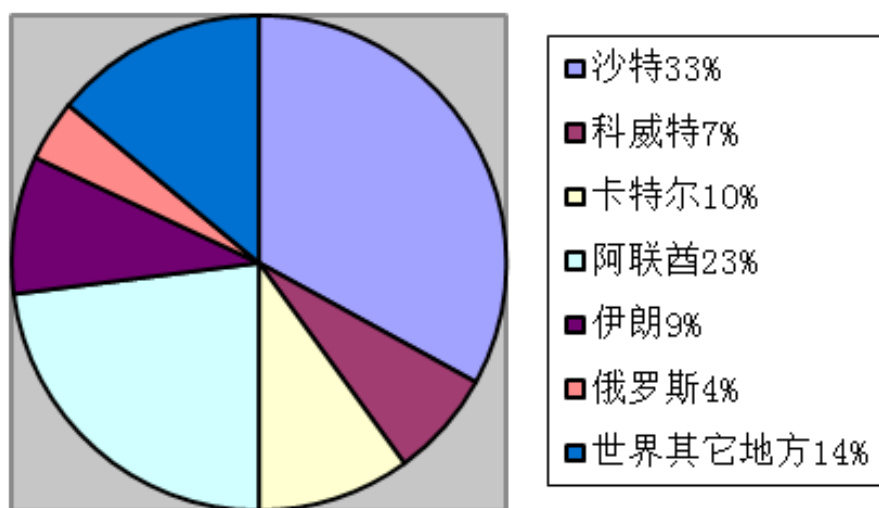


图2. 2011年日本原油进口源分布

过去30年，日本实施了大量改善能源安全的战略。最近的一项是2010年的“日本战略能源计划”。其目标之一就是减少天然气、煤炭和石油的消耗，同时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使用（分别增加91%和103%），从而将日本能源自给率提升

两倍，到2030年达到约40%。与此同时，日本在努力多元化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减少对原油的依赖。日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截止1985年，其液态天然气需求占了世界的近四分之三，是全球液态天然气工业发展先锋力量。与石油相比，天

能源种类	成本估计
核能	>8.9 日元 / 千瓦时
燃煤火电	9.5-9.7 日元 / 千瓦时
液态天然气热电	10.7-11.1 日元 / 千瓦时
燃油热电	>20 日元 / 千瓦时
风能	9.9-11.3 日元 / 千瓦时
居民太阳能	33.4-38.3 日元 / 千瓦时

表 1. 发电成本对比

然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其供应源比较多元，不像石油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中东这一个供应源。

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虽然已很成功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但日本并没有努力减少对中东的全面依赖。经过上世纪 70 年代的协同努力，到 80 年代末日本将中东原油进口的比例降到了约 70%。但是到 90 年代末，这一数值又回升到了近 90%。这就让日本处于了一个十分脆弱的境地——石油供应的主要来源是一个世界上政治最不稳定的地区，石油供应的路线要经过世界上几个重要的海上咽喉。2011 年 2 月的“阿拉伯之春”让世界石油价格上涨。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表达了对日本石油需求过分依赖中东的担忧。经济、贸易与工业大臣海江田万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称中东政治混乱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前景。2012 年 1 月，外相玄叶光一郎在谈到日本能源前景时称，日本

需要与能源供应国以及能源路线沿线国家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关系。

日本在加强与许多中东国家经济关系方面占据着十分有利的地位。它的商业敏锐、技术优势和管理技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都非常有价值。日本已开始通过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CA）展开了一场试探性的尝试，在中东各地成立了办公室，投入了大量小型合作工程，运用日本外交家山本英明 2006 年提出了“和平和繁荣走廊”理论利用资金和技巧推动更广范围的区域合作。

在保护中东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上，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声明的一个重点就是“采取积极行动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为此，日本已作为总部位于巴林的联合海洋部队（CMF）的一部分参与了它的行动。联合海洋部队的任务就是促进一些世界上最重要航道终点的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日本从 2003 年起就开始与该 26 个国家的联盟合作。虽然是独立运作，但日本向联合海洋部队总部派驻了三名联络

官员，并为通过亚丁湾的日本船队分配护航船只和海上侦察飞机。

另一份初步提案是通过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来改善印度洋海上交通航道的安全。该提案是在 2008 年日印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后提出的。印度潘迪特迪恩大雅尔石油大学的鲁帕克节尤提·博拉副教授指出，两国增强的防务关系（特别是海上安全和能源安全领域）已经通过 2000 年以来两国展开的海岸警卫队联合演习得到展示。

能源相关的外交

与俄罗斯

当前，日本 4% 的原油从俄罗斯进口。虽然仍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但要求从俄罗斯进口更多资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关于俄罗斯的原油储量有着不同估计，但其 2010 年的石油产量超过了沙特，成为当年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俄罗斯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地理位置上的毗邻也让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要比从中东进口近得多。此

外，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可以避开相对脆弱的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总而言之，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减少从中东的进口量将从长远降低成本，增加能源供应的可靠性。

对于俄罗斯而言，其 GDP 严重依赖能源。2011 年，石油和天然气占其出口总额的 65%。此外，俄罗斯还希望开发其远东和远北的石油和燃气资源，这就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和援助。对于能源匮乏的日本来说，这是一个绝佳机会。此外，虽然俄罗斯能源的传统市场在欧洲，但普京总统已明确了他的重点在亚太地区。

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两国仍未解决的北方四岛领土争端（日本称其为北方领土，俄罗斯称其为克里尔群岛）。虽然该问题十分复杂且根深蒂固，但近期两国关系似乎有改善的迹象。2012 年 6 月，两国领导人在墨西哥 20 国峰会期间进行了会晤。据报道，双方都同意重启领土问题谈判，并指示各自的外交部长寻找一个冷静环境展开进一步的实质性讨论。2009 年俄罗斯库页岛油田液态天然气工厂的启动以及到 2030 年每年向大阪供应超过 967 万亿立方液态天然气的协议是日俄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连同其它双边能源商业协议让当时的日本首相麻生

太郎表达出了这样的希望——这些计划让两国能够建立起更加友好、更加广泛的双边关系，包括最终解决北方领土争端。

与中国

2003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随着两国竞相保护各自能源的安全供应，紧张关系不可避免。两国的竞争的确也刺激了近年来亚洲油价的上涨，也就是所谓的“亚洲溢价”。不过，基于提升节能和能源多样化水平需求以及降低污染的共同战略利益，中日在一些能源问题上也开始了对话。两国能源部长于 2007 年 4 月进行了会晤，发表了一份在能源领域加强合作的共同声明，明确同意在节能、清洁煤炭技术和可再生领域加强合作。

两国之间更紧密能源合作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在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两国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双方都不同意彼此的海上边界）。对这些争议岛屿拥有主权就意味着拥有开发东中国海巨大近岸资源的合法地位。东中国海的燃气总储量达到 150 亿到 250 万亿立方米，原油储量在 700 到 1600 亿桶。两国都曾提出过在争议区域进行共同开发，但是双方都不同意对方提出的开发条件。一系列小的事件和冲突让形势持续紧张。2012 年 6 月，北京方面宣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与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能源供应伙伴。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运输成本相对较低，也最大程度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安全风险。2012 年 5 月时任日本参议院副议长直岛正行在访澳期间曾表示，澳大利亚是日本最重要的天然资源供应国之一，液态天然气和煤炭是日本从澳进口的两种最重要能源。2011 年，东京电力公司和雪弗龙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 20 年的合同，每年从西澳洲的惠特斯通燃气项目进口 310 万吨液态天然气。2012 年 5 月，东京电力又与惠特斯通签订了一份为期 20 年、每年进口 100 万吨液态天然气的初步协议。

福岛事故对日本能源安全的影响

日本 36 座核电站中的 10 个受地震的影响直接关闭。到 2012 年 5 月初，所有核电站关闭接受维护和安全检查，这让日本 42 年来首次面对无核电供应的局面。同时，福岛核电站的毁坏也严重影响到了更广区域内石油、液态天然气和燃气的供应。八个行政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影响了 40 万户家庭）。仙台的一个液态天然气基地关闭，这在日本还属首次。此外，石油精炼、石

油码头、油罐车和加油站都受到损坏，中断了更远处的能源供应。

为了应对电力短缺，日本将重点转向了矿物燃料，大量增加了液态天然气和煤炭的进口，重启从前关闭的热电站。海啸之后，日本燃料进口增加了 25%。燃料进口占 GDP 的比例从 3.6% 增加到了 4.6%。液态天然气进口额增加了 17.9%，到 2011 年底超过了 GDP 的 1%。

日本政府一直都在努力寻找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由于核电站的关闭所造成的即时能源短缺。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分散化电力生产控制，对地方政府下放更多的辖区控制权。但是日本电网有两个不同的运行频率，这使得东西部几乎不可能实现电力共享。

解决核能的安全关注

这场灾难之后，时任首相菅直人曾宣布日本将努力完全放弃核能。2011 年 9 月，野田佳彦担任首相。他将目标修改为尽可能在中长期减少对核能的依赖。对于日本来说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彻底放弃核能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短期看，电力供应将不能满足需求。长期看，放弃核能就意味着要进口更加昂贵的替代能源以及投入巨资进行替代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用说，日本领导层要么重新恢复公众对核能安全的信任，要么

找到不仅能达到 2011 年 30% 的电力产能，还能满足福岛事故之前制定的能源计划中提出的到 2050 年持续增加产能的规划要求的替代能源。目前正在讨论的选项包括彻底放弃核能、减少对核能的依赖以及保持当前的核能生产水平。

支持日本保留核能的理由非常明确，就是依靠一座已经建起的核电站发电不会产生任何二氧化碳或其它破坏环境的排放物；核能可以提高日本能源的多样化水平；核能相对便宜，特别是在初期投入后；如果再加工燃料得到利用，核能提高了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已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支持在日本保留核电生产的声音。日本能源经济学院在 2012 年 2 月就曾表示，鉴于核能的廉价、大规模和高产能，它日本能源安全的贡献不可小视。日本官方预计，如果完全放弃核能，日本的经济到 2030 年将会萎缩 5%。经合组织(OECD)敦促日本重启核电生产。安吉尔·葛利亚秘书长 2012 年 4 月较为明确指出：“你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替换掉 30% 已经建立起来的产能。”可以理解的是，出于对未来发生类似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担忧，“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恐慌情绪在日本逐渐高涨。日本与太平洋和鄂霍次克海构造板块的位置关系几乎肯定了未来还会发生大型

地震和海啸，能源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着严重威胁。

虽然有评论员相信日本公众不太可能重新接受核能，但是至少两个地方的居民已经同意重启核反应堆，表示如果继续关闭核电站，当地经济就会遭到重创，失业率就会攀升。2012 年 6 月初，虽然遭到了公众示威和在东京每周一次的公众示威活动，但其中一个反应堆还是重启了。参与反对核电站示威活动的人数从 17000 到 15 万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日本这样一个很少发生公众抗议的国家的的确确发生了示威，充分显示了公众对核能安全的关注程度。

其它环境 and 经济问题

中短期，用矿物燃料替代大部分的核能将大大增加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即使在这场灾难之前，日本的电力生产也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煤炭，在可再生能源工业发展方面落后于经合组织的其它国家。但 2011 年 6 月，菅直人首相拟定了一项旨在到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增加到 20% 的计划。从此，日本开始引入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法律、回购费率政策以及到 2030 年在一千万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的政府计划。

与此同时，现实情况是日本无法负担如此多的能源进口。日本公

共债务占 GDP 的比率是世界上最差的，达到 230%。欧洲的这个数值是 82.5%，澳大利亚是 23%。虽然大多数债务是向日本公众发放的，但它仍是政府财政管理面临一个重大问题。2011 年的贸易赤字特别引人注目，日本 31 年来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从一个贸易顺差国（6.6 万亿日元盈余）变成了一个贸易逆差国（2.6 万亿日元赤字），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上涨的石油和液态天然气价格以及增加的液态天然气进口量。2012 年 1 月，日本贸易赤字达到了 170 亿美元，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进口了大量的液态天然气和其它能源。

随着地区石油需求的增长，价格也将随之增长。东亚和东南亚 1999 年到 2009 年间的原油消费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上不断增加的车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确，该地区的原油消费十分巨大，只有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是净出口国。虽然日本的石油需求已经下降（在上世纪 70 年代占了整个亚洲原油需求的 60%），但是它仍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净进口国。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一直在向日本施压，要求其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虽然很大程度上听从了美国的要求，抵制伊朗石油，但对石油的

严重依赖特别是作为核能的替代品将让日本很难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一直抵制下去。

结论

明年对于日本能源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决策层要在核能对国家未来能源的贡献率上进行抉择。如果没有了核能或大大降低了核能生产，政府就要努力促使替代能源的发展。日本有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需要的自然资源，如太阳、风、海浪和河流，也有发展这方面工业的技术。但该领域需要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支持才能成为支柱供应源。

短期内，保留核电的主张似乎占据上风。日本经济相对脆弱，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债务。重启一些反应堆将有助于防止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能源短缺。一项措施就是可以根据安全风险因素和位置对反应堆进行分级，让它们按顺序恢复生产。这种措施至少要持续到可再生能源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或可替代矿物燃料供应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

如果决定不大规模重启核电站，日本就需要继续增加矿物燃料的进口，这将导致成本的大大增加（远离温室气体的排放目标），刺激日本参与国际战略，迫使东京重新审视各种双边关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福岛灾难似

乎让许多日本决策者“向内看”，而不是“朝外望”。日本有机会跨越东亚，进一步改善各种双边和多边关系。用前国际能源机构执行总裁田中伸男的话就是：“丰富和廉价能源对于日本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在日本必须基于整个亚洲的能源安全而不单是自己国内环境制定能源政策。”

作为能源外交的一部分，日本已经与很多邻国进行了接触。福岛灾难不仅带来了确保与俄罗斯展开有利能源交易的机会，还带来了与这个最大邻国改善关系的机会。更广范围，日本还可以更主动地与其它亚洲国家分享自己在节能、能源多样化、可再生能源以及原油储备等领域的技术。更加广泛地共享自己的节能技术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将对整个区域有利，缓解需求压力，让日本自身目标更有可能实现。

日本核能小组的村上知子 2012 年 5 月写到：“日本决策者们必须提醒自己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日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上世纪 70 年代石油震荡后，日本减少对石油依赖的努力值得称赞并是有效的。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日本能否用同样的方式从福岛灾难中重新站起来。

（本文译自《澳大利亚国防力量杂志》第 190 期，原文作者是琳达·麦凯恩）

中亚地区安全体系构建

[知远导读]

白俄罗斯“军事政治观察”网站2013年4月10日发表题为《中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体系架构》的文章。文章认为，中亚国家在安全保障方面面临着新形势，但中亚国家地区在安全保障方面却表现出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即一直没有对自身的安全保障体系构建有明确方向。作者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亚信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及地区性组织在保障中亚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局限性及其发展前景进行全面分析，并指出了中亚国家构建安全体系的可能模式。

鉴于一系列原因，完全有理由在中期着手消失不符合当前中亚现实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旧有安全保障因素。可以肯定地说，诸如北约军队撤出阿富汗，北约打算向中亚国家提供包括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技术援助这些情况使中亚安全面临着新形势。

如果说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地确立了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倾向性，并随后构建了自己的安全保障体系的话，那么中亚国家直到现在还处于经受“连续的折磨”的过渡期。中亚地区目前表现出“三不”的特征：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

可预测性。如果说欧洲的地区安全保障是建立在北约、欧盟以及欧安组织基础之上，那么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和谐构建且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欧亚大陆安全保障架构。

但是仍然存在若干能够开启中亚的过渡进程并对中亚安全产生影响的因素：即与外界地缘政治积极性相关的因素以及源于中亚内部政治进程的问题。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至今都没有形成保持政权连续性的机制，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不符宪法的政权更替已经发生的两次，这些都使得中亚国家在今后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方

面总体上带有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中亚地区在国际安全方面还表现出地缘政治的不平衡性，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既加入北约伙伴计划，同时又是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

多数专家都将希望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为基础构建欧亚大陆和中亚地区安全体系。

过去的2012年对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在塔什干签署集体安全条约已经20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立也已经10

年。然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没有自己的发展构想，且对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这就使得其作用、权威性和发展前景受到置疑。

尽管有自己的军事体系，但作为安全政治聪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还是表现出与北约的不同，它一次军事行动都没有参与过。虽然它在完成与犯罪行为做斗争方面的具体任务时采取过某些行动，但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从未参与过遏制和消除冲突的行动。

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演化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正面进展是：与北约或欧盟一样，该条约的成员商定准备用同一声音表态的外交问题目录。2011年独联体集团安全条约成员国的领导人商定，只有在条约成员国全部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在该组织成员国境内部署第三国军事基地。正如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所说：“现在，第三国想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境内部署军事基地，必须获得该组织全部成员国的同意。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成员国的赞同，这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全体成员国忠于联盟关系的鲜明例证”。这是近年来该组织在实施协同政策方面的唯一一个决议。然而，考虑到对所采纳决议无需负责，而且任何一个成员国

都有可能退出该组织或是重新加入该组织，该协议仍然是一个形式上的声明。

开始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一机构进行制度改革、形成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战略、以实际举措取代在政治生活中无法实施的声明的条件早已成熟。鉴于20年的时间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12个成员国中有3个退出这一情况（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应该让成员国觉得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更有吸引力，更有前景，从而使愿意加入这一组织的国家在数量上多于想退出这一组织的国家。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制订出符合当前保持成员国安全稳定要求并且体现联合思想的战略。

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该组织的任务及主要使命方面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主要的是，在这一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上也没有一致意见，这就使得其前景堪忧。2013年3月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组建负责制订发展战略和构想信息分析机构这一消息为该组织的发展注入了希望。在乌兹别克斯坦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背景下，重新修订章程、使退出该组织的程序进一步复杂化的时机可能正在到来。正如北约所认为的：谁不和我们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不得不指出，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退出破坏了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地区完整性和一体性，构建设有乌兹别克斯坦参加的安全体系的努力最终注定要失败。

另一个与中亚地区安全有关的组织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该组织应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倡议于1999年成立，该会议通过《亚信会议成员国相互关系宣言》。

该文件宣称，成员国关系原则为合作、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裁军及其它。然而，考虑到签署该组织协议国家中阿富汗不能控制自己的领土完整，印度和巴基斯坦处于永久冲突状态中，在该组织内看到更多的是对通用原则形式上的宣示，但却并没有为遵守和实施这些原则提供现实基础。应当指出，该组织是在未对地区形势做现实评估的条件下成立的。由此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亚信会议在保障亚洲安全方面没有做出什么显著贡献，这就说明了该组织在建立成员国间的信任方面没有实质性结果。

“上海五国”的经验在很多方面展示了这一组织独有的很高的潜力。正如中国专家所给予的公正评价，在维护边界安全、保障地区稳定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其它任何一个地区性组织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由于不带有“集团”的标签，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借此来显著提升

自己威信，因为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以伙伴关系，而不是联盟关系为基础构建了安全保障的新体系。

尽管如此，北京方面还是积极地利用上合组织实现自己的利益，并试图以此来改变地缘政治平衡以及中亚国家传统的国内及国际关系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也是这一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俄罗斯和中国对上合组织的理解不同：如果说中国方面将上海组织看作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的项目，那么俄罗斯方面则将保障地区安全视为该组织的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大国在发挥影响力方面的竞争有可能加剧。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中国，保持竞争并发展互利合作都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起制订经过理论论证并付诸文字的《在中亚地区发展俄中伙伴关系的长期战略》。否则，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政策在中亚地区注定没有成效，不能够对发展世界一体化进程产生任何影响。应该说，上合组织不是一个一体化联合组织，目前显而易见的是，它正在经历为时颇长的自我认同的阶段。

但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广义上的，从资源及经济规模到政治精英的质量方面的差异衍生了该组织

继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即：缺乏明确的发展构想，成员国间在关键性的地缘经济问题、地缘政治问题，甚至是上合组织现行体制中的职能问题上存在分歧。

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基本上带有宣言性质，也就是说，仅局限于通过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公约。在归纳时我们遗憾地指出，上合组织的合作形式仅仅是信息交换、建立共同数据库，使成员国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上达成一致。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则可以被认为是上海组织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实际性举措，但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参加军事演习。

上合组织的经验作为国家间就共同安全问题进行建设性区域合作的经验，对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安全问题的解决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团结而不是分离的意义。

上合组织的经验对在亚太地区探索东亚区域安全体系的模式十分有益。作为建立地区安全现实机制以及调解边界争议问题的经验，“六国”的活动无论对于亚太国家，中东国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南亚国家（印度、印度洋国家）都十分有益。同时，上合组织也提供了在不损害小国利益的前提下处理大国（俄罗斯、中国）

和小国（中亚国家）关系的经验。

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可以将中亚国家安全体系可能出现的发展模式归纳为：

- 完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作用机制，参与调解不同性质的冲突，促进欧亚一体化；

- 通过扩大军事合作提升上合组织作用，此后可能导致中亚地区的“中国化”；

- 在地区安全体系构建中没有进展，由此导致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和混沌化，甚至是碎片化；

- 随着北约作用的增强，有可能建立西方主导的安全模式，但这一点的可能性较小；

- 中亚国家在寻找到构建自身安全体系途径的条件下，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这一点在现阶段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中亚的转型是以如下方式展开的，即这一地区同时进入四个不同的地缘政治方案，即：欧亚联盟、中国道路、西方模式和伊斯兰模式。

就总体而言，尽管不同的国际组织都试图在为巩固中亚地区安全贡献力量，但所有的国际合作都局限于情报交换、联合演习、军事技术装备方面开展互助，而不是在解决安全领域面临的迫切问题上采取真正的联合行动。

很难对北约及诸多实际上是独

立行动，但在某些方面又相互模仿的独联体、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和亚信会议的效能进行比较。这些组织不仅到目前既不能在成员国间加强互信，也不能从构建统一理想，在组织内统一立场的角度出发，对这样或那样的国际事件给予一致的评价。

当前，中亚地区成为世界主要政治力量提供的不同的“地缘政治方案”相互碰撞的地区。中亚国家

施行“多元化”外交，加入大量国际化的地区性组织，由此形成了中亚在地缘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中亚国家所加入的这些国际化组织中一些组织彼此对立，另一些则相互模仿。

在对诸如亚信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合组织进行研究后，可以发现它们的行动存在相似性，有鉴于此，按照安全保障领域和参与解决国际问题的阶段划清这些组

织间界限的时机早已成熟。如果一直保持目前的态势，今后它们之间将会产生竞争，由此造成不必要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消耗，最终导致：就个体而言，降低每一个组织的工作成效，就总体而言，降低中亚整个安全体系的成效。

（剑冰译自白俄罗斯“军事政治观察”网站，原文作者是扎米拉·穆拉塔里耶娃）

南中国海上空的风暴

〔知远导读〕

理查德·哈洛伦在美国《空军》杂志2012年8月号上发表文章：Storm Cloud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本文介绍了在南中国海出现的领海纠纷、对峙事件及复杂原因，回顾了美军在该海域周边进行的重要军事演习。美国认为南中国海对其非常重要，期望参与该海域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随着其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会进一步加强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

相互不信任、国际军力加强和竞相宣称领土主权，使中国认为是其内海的重要航道内充满紧张。

在所有可能会引爆美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间全面敌对行动的潜在导火索中，最危险的一个会是南中国海的对峙。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的这条通道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经济 and 战略冲突的场所——是一个不明确的地方，充满了误判的可能。

关键问题是进入全球最繁忙航道之一的海上通道。每年超过一半的世界航运经过南中国海，要比通过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航运

加在一起还要多。2011年，大约有7万艘船只沿着这些海上通道运输价值5.3万亿美元的商品。其中价值1.2万亿美元的贸易直接影响美国。据估计，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进口石油中，80%的经由南中国海运输。总之，对于北美和东亚



图1 2010年“勇敢之盾”演习期间，一架F-15战斗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越过停在地面上的两架E-3B预警机上空。安德森空军基地距离南中国海约1700英里。

地区每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包括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的盟国，通过这片海域的运输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战略上讲，自由通过南海对于美国在东亚和南亚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美国军舰经常通过其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往返于这片海域。如果这条海上交通线中断，将迫使舰船向南绕道澳大利亚附近航行，从而航行时间将增加两周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其对这片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因此可以决定谁能够进出那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历史记录表明几个世纪以来南中国海一直是其一个内部水道。即使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前，中国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期，中国也主张南中国海属于中国。

中国官员曾多次要求美国军舰不要在南中国海进行演习，尤其是不能在那里同东南亚国家的海

军一起训练。有时候，中国人干扰美国军舰，这违反了国际海事规则。中国不认可东南亚国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提出的专属经济区主张。

航行自由

美国和南中国海周边的大多数

国家却反其道而行，坚持认为南中国海是国际航道，长期的海运规则 and 传统决定了这里的航行自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曾多次声称，美国将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同样，美国国防部长莱昂·E·帕内塔（Leon E. Panetta）也一直强调，“美国对航行自由的持久承诺和我们对于海上安全常见做法的支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尽管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是美国历届政府都表示美国将遵守这些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中国所有的武装部队，已经扩展其作战范围到南中国海。中国的南海舰队（South Sea Fleet）已经成为该国最大的舰队。它在南中国海西北部的海南岛有一个新的基地。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其他机



图2 南中国海地图。

构曾断言对这片海域有管辖权。中国称这些机构为“9 条龙”——根据搅动大海的龙的传说。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的一份研究报告实际上列出了“11 条龙”，这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渔业管理局，中国海监局和外交部，再加上沿海的 3 个当地政府和几个执法机构。

“这些机构大多数当初是为执行国内政策而建立的，但是现在它们扮演了外交政策的角色”，国际危机组织说。“它们几乎对外交格局没有任何了解，也对推进国家外交政策的议程兴趣不大。这种注重狭义机构或者行业利益，往往意味着它们的行动对外交政策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此外，这份报告还指出，“某些强硬派学者和退役军官在推动过分自信处理领土和海洋经济纠纷上扮演着高调的角色。”

从日本向南到澳大利亚、再向西到印度，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庞大三角形内十多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也使南中国海内对峙的可能性更加复杂。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宣称拥有这片海域下，但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无法测量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这些主张中很多相互冲突和重叠。此外，南中国海渔产丰富，为其沿岸国家提供了必要的食品。

另一个复杂情况由经常在南中



图 3 中国首艘航母将加入南海舰队，母港设在海南岛。中国将这艘前苏联的航空母舰命名为“施琅”号，在艺术家构想图中搭载歼-15 战斗机——歼-11B 战斗机的舰载型。

国海及连接其与公海的海峡内出没的海盗引起，尽管沿岸国家间在反海盗巡逻方面加强了协调。国际海事局海盗通报中心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s Piracy Reporting Center) 追踪以吉隆坡、马来西亚为大本营的海盗，曾经报道仅在 2012 年上半年就发生了 58 起海盗袭击事件，其中 32 起发生在印尼水域。国际海事局指出，许多海盗袭击可能没有被报告，因为这将导致保险公司提高费率。

另外，殖民主义遗留下来更多无形的复杂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日本和泰国，环绕南中国海或其周边的大部分国家受制于殖民势力。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都获得了独立，但殖民主义的记忆仍然严重，

且非常认真地对待国家主权。反过来，这往往使这片海域周围的国家不愿意参与其认为可能会影响其独立性的多边军事行动。

绘制红线

同南中国海相反，台湾海峡或朝鲜半岛潜在冲突的问题相当简单。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 的一位军官说：“我们已经绘制了红线，我们知道它们在哪里，中国人也知道它们在哪里。”然而，美国在南中国海内及其周边显示存在，是通过参与、演习和联合训练，而不是通过永久性基地。这些行动是为了安抚美国的盟国和朋友，并威慑潜在对手。合作军事演习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在 2011 年的近 150 场演习中，



图 4 在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的斯卡伯勒浅滩对峙期间，抗议者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大使馆外举行集会。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及其下级组成单位不仅训练了部队和领导人，而且也留下了较少的痕迹，从而排除了大量美国部队永久驻扎在外国土地上经常引起的大部分问题。美国部

队通过飞机或舰船到达演习地点，然后同东道国的部队一起训练，最后再回到飞机或者舰船上返回原驻地。

南中国海的危险和同中国对抗

的可能性部分是由奥巴马政府要求建立“太平洋支点”所引起——尽管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坚持说美国重新强调亚洲并不是针对中国。在公开场合和五角大楼内部，美国政府都已经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

美国部队正在寻找通过同东南亚国家共享南中国海情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的方法，而这些国家缺少美国部队的这种能力。具体来说，“终极愤怒”演习(Terminal Fury)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危机规划和执行战争计划中训练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最重要演习。今年的演习主要集中在太空、网空行动和南中国海。第二个作战演习是“勇敢之盾”(Valiant Shield)，它训练空军和海军领导人保卫东亚和东南亚的岛国。

在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中，澳大利亚是历史最悠久和最坚定的——随着美国聚集南中国海，已经变得更加重要。美国空军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主要演习中，“一片漆黑”(Pitch Black)演习使空军官兵获得联合进攻作战的经验；“护符佩剑”(Talisman Sabre)演习训练空军官兵进行迅速预警、投送力量和强行进入作战；“对抗北方”(Cope North)演习训练美国空军、澳大利亚皇家空军(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 RAAF)和日本航空自



图 5 美国空军上尉拉斯·柯克林驾驶 B-52 轰炸机接受 KC-135 空中加油机授油，为参加 2011 年“护符佩剑”美澳联合军演做准备。随着美国将其注意力转向西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仍然是其一个重要的盟友。

卫队 (Japanese Air Self-Defense Force, JASDF) 一起从关岛上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Andersen Air Force Base) 飞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也可以进出马来西亚的空军基地，他们从那里飞到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空执行侦察任务。

展望未来，驻太平洋空军部队已派出多个小组评估澳大利亚内的地点，重点放在增加美国空军向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空军基地和廷德尔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飞机轮换，从而可以启动同澳大利亚国防军一起实施更加强大的训练和演习计划。驻太平洋空军部队正在考虑在夏威夷设立一名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联络官。

在澳大利亚方面，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完成并于 2012 年 5 月发布的澳大利亚国防态势评估报告，建议美国允许通过澳大利亚北部的空军基地轮换更多的轰炸机、空中加油机、侦察飞机，包括“全球鹰” (Global Hawk) 无人机。

在其他军种方面，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开始向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轮换部署一支 250 人连级规模的部队，并计划逐步扩大到同时部署 2500 名海军陆战队员。

美国海军计划更加频繁地停靠澳大利亚港口，因为澳大利亚的防务审查认为，澳大利亚西海岸现有的海军基地可以支持美国海军更多的港口停靠。

美国陆军正在考虑同澳大利亚陆军进行更多的联合演习，但是不会重复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做的事情。然而，这份防务评估报告解释说，“不会在澳大利亚建立永久的美军基地”。

美国在着眼于解决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的同时，还正在扩展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区大国的防务关系。

新加坡已经建造了一个保障美国航空母舰的码头，并建设了一个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相适应的作战中心。这个城市国家已经邀请美国在那里有一个海军基地部

署多达四艘濒海战斗舰。现在暂定在 2013 年春天部署首艘濒海战斗舰。因为新加坡周边的空域非常有限，所以该国的 F-16 飞行员在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 (Luke Air Force Base) 进行训练，其他飞行员在澳大利亚进行训练。

无事生非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在南中国海中部无人居住岩礁上的紧张对峙从 2012 年 4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当年夏天，这展示了那些搅动那片海域的问题，并突出了误判的风险。专门研究南中国海问题的新加坡学者罗伯特·C·贝克曼 (Robert C. Beckman) 说，“这是一



图 6 在 2010 年“一片漆黑”跨国军演期间的一次出动后，新加坡共和国的 F-16 战斗机编队飞过澳大利亚达尔文上空。



图 7 在 2011 年“护符佩剑”演习期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下士菲尔·斯宾塞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威廉姆森机场一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附近加固设备。这次演习加强了互操作性和战备。

个领土主权纠纷的经典案例。”这片岩礁在国际上以 18 世纪一艘失事船只的名称被称为“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而菲律宾称之为“帕纳塔格”（Panatag），中国称之为“黄岩”（Huangyan）。

中国已经发布了一份法律简报，认为它“首先发现了黄岩岛，给其起了这个名字，把它纳入其领土，并行使司法管辖权。”这份简报说，“在 1279 年，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受元世祖忽必烈委派，对中国周边海域进行了调查，黄岩岛被选为测量南中国海的标志点。”

菲律宾声称没有必要回顾那么久远的历史，但是

断言这些岛屿在截至 1898 年西班牙统治的 300 多年间属于菲律宾。马尼拉的官员们指着 1734 年和 1792 年绘制的地图来说明他们的观点。

2012 年 4 月，菲律宾人试图逮捕在其专属经济区偷捕的中国渔民和渔船。中国派出 3 艘海监船保护这些渔民，菲律宾派出海岸警卫队的两艘军舰进行回应。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这场僵局得到缓解，菲律宾人和中国人都驶离那里。然而，在 2012 年 7 月，中国派出 4 艘海监船进入南海对这片水域宣称主权。这些海监船遇到了一艘其指控侵犯中国领海的越南船，并迫使它驶回家。北京的一位发言人公开承认将在南中国海部署军舰的可能性。

菲律宾、其他沿岸国家和美国已呼吁进行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和其他类似纠纷的谈判。中国人主张，那些水域都是中国的，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此外，他们已经要求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任何对话都应是双边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间——因为北京不希望面对管理南中国海利用的行为守则的统一多边建议。

最后，中国已经要求美国不要涉入关于南中国海的任何讨论，声称这一个亚洲的问题。克林顿和帕内塔都同样有力地宣称，南中国海涉及到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期待参与解决方案的制定，尽管华盛顿不会偏袒主权要求有冲突的任何一方。

作者简介

理查德·哈洛伦，先前担任《纽约时报》亚洲国外记者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军事记者，如今是一名常驻檀香山的自由撰稿人。他最近为美国《空军》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美国、台湾和中国的巨大阴影”发表在 2012 年 4 月号上。

南亚地区冲突：原因、后果及前景展望

[知远导读]

本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的一篇工作论文。作者对南亚地区的冲突进行了分类，总结归纳了引发冲突的原因，即殖民统治造成的恶果以及独立后民族和国家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动荡，分析了冲突产生的影响并展望了南亚地区冲突的发展前景。

冲突研究是一项宏大的智力工程。2012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在一项调查中列举了 100 家顶尖智库，其中有超过 60% 的智库对冲突及冲突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武装冲突领域，而那些由大国干涉或全球秩序运转的强制性需求引发的冲突只是偶尔或偶然得到了人们的关注。随着“阿拉伯之春”现象向其他地区蔓延以及人们更频繁的在联合国框架内以行使“保护之责”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的形式实施干涉 (正像我们在利比亚看到的或有可能在叙利亚看到的那样)，对冲突进行研究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热点。不过，在研究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全球政治条件”所发挥的作用。就此而论，西班牙前外交部长、北约前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 (Javier Solana)

和欧亚集团 (Eurasia Group) 总裁伊安·布莱默 2013 年 1 月 21 日在文章中评论说：“在当今世界，找出和处理热点问题并不是摊开地图，找到出事地点，然后派遣外交官平息事态那么简单。要把目前的重大冲突和对立搞清楚，我们必须弄明白全球政治环境是怎样引发这些冲突和对立的。在那些有条件阻止或终止冲突的各方无法或不愿意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冲突更容易出现或持续进行下去。”

可能有人会进一步认为，如果世界大国以及他们建立、维护和管理的全局力量体系出于战略利益或其他利益方面的考虑而持续推动或助长冲突的话，那么冲突就不会停止。在研究冲突的时候，资源冲突和人类安全方面的问题一直被忽略了，直到上世纪末这些问题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但直到今天，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投入的精力和资源仍

然不够。

在冲突研究中，南亚已经成为了一个倍受关注的地区，难道不是吗？要知道，南亚地区曾发生过 5 场国家间的全面冲突，冲突各方中包括有核国家和亚洲大国，有些国家还成为了全球恐怖主义中心的组成部分，而且该地区的国家都没有摆脱叛乱分子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困扰。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其建立的武装冲突数据库 (Armed Conflict Database, ACD) 中确定了 9 场发生在南亚地区的国内和国际冲突。南亚地区的很多智库 (包括政府资助的智库和附属于公立大学的智库) 都在对冲突进行研究。过去 6 年来，新德里一家名为和平与冲突研究所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PCS) 的智库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有关“南亚武装冲突”的会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也会定期统计有关南亚冲突的信息。在本文中,我们要确定南亚地区冲突的类型,对引发这些冲突的原因以及冲突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

冲突的类型

南亚地区的冲突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冲突大致可分为4类,即:(1) 由全球政治形势、战略形势和发展形势(包括大国发挥的作用)导致的冲突以及因这方面因素而升级的冲突;(2) 历史延续下来的、由战略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国家间冲突;(3) 由国内政治动荡、社会文化断层和发展不平衡导致和滋生出的冲突;(4) 由非国家行为体引起并主导的冲突。第一类冲突包括由地区外力量和因素引发的冲突。举例来说,“9·11”事件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由此导致的南亚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冲突就属于第一类冲突。迫于冷战的形势,苏联在1979年到1980年期间武装入侵了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此实施了反制,由此引发的南亚地区冲突也属于第一类冲突。1962年中国对印作战也是地区外国家参与导致的冲突。冷战还导致了南亚地区的各种地区性分歧的加深和激化并使该地区的国内冲突和国家间冲突复杂化,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尽管全球秩序态势中的战略要务对南亚地区的冲突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全球发展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通过推动和加强许多国内冲突也逐步对这些冲突产生了间接影响。比如说,虽然全球化进程发挥了很多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致使南亚地区面临的问题和烦恼雪上加霜。在第二类冲突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直接冲突占有重要位置。第三类冲突包括南亚地区所有的叛乱和种族/宗派冲突。第四类冲突包括恐怖组织的活动(比如2008年的孟买袭击)以及叛乱分子和犯罪团伙的跨边界行动。

这几类冲突中包含的冲突可以是武装冲突和暴力冲突,也可以表现为外交关系紧张、严重的分歧和非暴力民众抗议。武装冲突和非武装冲突都有互相促进和互相转化的倾向。冲突管理的学问和艺术的侧重点就在于将暴力冲突转化为非暴力冲突,并防止非暴力冲突中出现暴力。引发南亚地区国家内部非暴力冲突的原因包括:领土争端,使用或共有的水、能源、渔业等地区资源上的分歧,在贸易、转口和投资等问题上的争议和分歧以及人口跨境迁移等等。

第四类冲突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有关,近年来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在基地组织发动“9·11”

袭击以及恐怖组织激增之后。恐怖组织会在有国家支持或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开展跨国行动。2012年,在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希夫香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冲突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现在,冲突的性质有了根本变化,它并非仅仅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而是随着冲突特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间的冲突必然会减少。然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冲突却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的情况下。正像我们在西亚地区看到的那样,非政府组织、社交媒体等等会产生能动的实际影响,最终会导致政权更迭。另外,技术的进步也使得非国家行为体有能力对国家形成重大挑战。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差别消失以及国家主权的界限被削弱造就了新局面,这需要我们用崭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以上对冲突的分类是为了便于分析,因此从现实表现看,发生的冲突不一定局限在某一类。很多时候,一种类型的冲突引发另外一种类型的冲突会使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国家和分析人员处理起来更为困难。1971年那场导致孟加拉国独立的印巴战争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场国家间战争是由巴基斯坦的国内动荡引发的，巴基斯坦军事政权采取了专制和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当时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要求，导致了国内动荡。巴基斯坦政府成立的哈姆杜·拉赫曼委员会(Hamoodur Rahman Commission)在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印度在利用巴基斯坦国内冲突上有着战略利益，但如果巴基斯坦没有爆发国内冲突并且冲突的蔓延没有对印度造成不利影响的话，那么这些利益就无从谈起了。巴基斯坦的军事镇压导致了种族屠杀，结果有1000万难民涌入了印度。冲突的蔓延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些后果的漠不关心迫使印度出手干预。而后，美国和中国出于各自在南亚地区战略利益的需要直接卷入了这场地区性国家冲突。当时的背景是，冷战正在盛行，美国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军事同盟。在国内冲突蔓延到邻国从而引发国家间冲突方面，南亚地区还有很多例子。

以上所列的南亚地区冲突类型之间不存在任何层级顺序或先后顺序。人们普遍认为，国家间冲突已经逐渐被国内冲突所取代，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南亚地区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内冲突与国家间冲突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互相渗透。而且，冲

突类型的发展也是非线性的。无论看起来有多遥远，印巴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或者中印之间公开爆发冲突或者印度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南亚地区的一些最难控制且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比如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和尼泊尔毛派暴乱)已经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谁也没有预料到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LTTE)在2009年会被斯里兰卡军方完全剿灭，也没有人会想到在印度和国际社会悄无声息的非正式斡旋帮助下，尼泊尔的毛派会与主流政党握手言和，同意进行和平民主转型。不过，冲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得到了解决，也不意味着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完全得到了解决。在斯里兰卡，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种族问题仍然遥遥无期。在尼泊尔，尽管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但建设一个新尼泊尔的承诺仍然有待实现并制度化，而正是这样的承诺才使得毛派融入了国内的主流政治活动。

爆发冲突的原因

南亚地区爆发冲突的两大根源是：殖民统治造成的恶果以及独立后民族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动荡。殖民统治造成的3个恶果很有可能引发冲突：(1)建立了不正常、不

合理的国家体系；(2)国家间的分界线没有确定；(3)各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派和社会团体的社会地位没有确定。导致南亚地区殖民统治终结的不是独立战争而是由印度发起的和平斗争。这场和平斗争的胜利也使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脱离了殖民统治。不过，印度的一大块国土将巴基斯坦分为了东西两部分，从而造就了一个不正常、不合理的国家。这种情况直到23年之后才得以扭转：在经历一场激烈的地区冲突之后，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成为了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尽管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和全印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出于短期政治利益的需要对殖民统治者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持支持态度，但从战略上说，这种政策却对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一个强大且顺从的穆斯林国家用来对抗该地区的穆斯林产油国和抵御苏联的南进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传统的英国殖民利益与新兴的美国利益在这里融合，通过从战略上对整个世界进行划分形成了冷战的轮廓。然而，国内宗派林立导致了巴基斯坦国内民族认同的不确定，并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两国内部常年不断爆发宗派冲突的诱因。

殖民者与当地政权进行权力移交所采用的方式很荒谬，在主权至

上原则的运用过程中也有内在的荒谬性。主权至上原则不但使得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并巩固新国家变得非常困难且容易发生冲突，而且还导致了引发印巴两国紧张和战争的源头问题的产生（如克什米尔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很多方面来看，殖民者想要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分裂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当年，印度最后一位总督蒙巴顿（Mountbatten）将军坚决主张克什米尔可以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但同时他还主张要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克什米尔的归属。将克什米尔加入印度作为印度为克什米尔提供保护来对抗巴基斯坦部族入侵的条件阻止了巴基斯坦通过军事手段来觊觎克什米尔，而附加条款“公民投票”反过来也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变得遥遥无期、充满变数并存有争议。

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边界划分问题仍然是南亚地区容易爆发冲突的原因之一。英属印度与阿富汗和中国之间有两条未定的边界线，即杜兰德线（Durand Line）和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杜兰德线问题上有重大争议，麦克马洪线问题则导致了中印 1962 年的战争，而且麦克马洪线问题至今仍然很可能导致中印之间爆发冲突。麦克马洪线在英属印度和西藏之间

的部分还导致了中国与不丹之间关系的紧张。将印度和原东巴基斯坦之间的雷德克里夫（Radcliff）分割线作为印度与孟加拉国分界线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印度与孟加拉国在 1974 年和 2011 年 9 月分别签署了边界协议，解决了一国在另一国领土内的飞地这一复杂问题。不过，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印度国会还没有批准这两项协议。仍然有待巩固的雷德克里夫线也导致印巴两国在爵士湾（Sir-creek）地区分界线变得脆弱和敏感。1972 年印巴两国签订了西姆拉协定（Shimla Agreement），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国没有完成控制线的划定，从而导致了两国在锡亚琴（Siachen）冰川地区的冲突。在划定边界线问题上的争议也使印度与斯里兰卡和尼泊尔之间的关系饱受困扰。1974 年和 1976 年，印度和斯里兰卡分别就卡此沙提武岛（Kachchativu Island）和保克海峡（Palk Strait）的海上边界问题签署了双边协议，从而和平解决了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在印度与尼泊尔的划界问题上，由于两国共有河流的改道，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我们在上文曾提到，南亚地区的某些冲突是受到全球政治和战略秩序影响，由本地区之外的一些因素引发的。2011 年，美国对阿富汗发起了攻击，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多

年的“全球反恐战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直接卷入其中，印度也间接受到了牵连。美国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打击可从很多方面合理地解释为对基地组织“9·11”袭击及其对美国实施的规模空前的恐怖活动的报复行为。不过，“9·11”袭击却远远不止恐怖主义活动那么简单。说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附带破坏可能有点过头了，但我们必须要客观地说，对白宫（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明显目标）、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的 3 次袭击是为了打击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而精心谋划的。袭击的目标并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美国力量和优势的象征，基地组织对美国力量和优势一直心存怨恨，并一直准备对其发起挑战。从另一方面来说，“9·11”袭击是对冷战结束以来的单极世界政治秩序的一次打击。美国和北约军队已经制定计划，要在 2014 年 7 月份之前从阿富汗撤出。不过，战争结束后的阿富汗形势及其对南亚地区冲突的影响仍有待观察，这些影响可能对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长期安全形成巨大挑战。

阿富汗战争并非由地区外力量干预或世界政治态势的强制性需求在南亚引发的第一场冲突。前苏联于 1979 年 12 月入侵了阿富汗，这是地区外力量介入南亚的一个更糟糕例子。在后续冲突中，巴基斯坦

也卷入了进来。显然，当时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之间强大的冷战冲动是此次地区外力量介入的背后驱动力。苏联解释说，他们的干预是对美国在阿富汗秘密行动做出的反应，并把阿富汗视为了其在中亚地区的软肋。美国却认为苏联的军事进攻是要经过巴基斯坦打通通往印度洋的通道，因此与巴基斯坦等国携手合作，竭尽全力要挫败苏联的军事干预。在此次与苏联的对抗中，中国加入了美国的阵营。随着冷战上升到一个新层次，中国从与苏联的结成的意识形态联盟中脱离了出来，并与美国拉近了关系，以应对其与前共产主义盟友之间的分歧。

另外一场由外部强加给南亚国家的战争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在历史教科书上，这场战争一般被描述为亚洲两大邻国因领土纠纷导致的边界战争。从很多方面来看，确实是这样。但如果说中国仅仅是为了领土要求以及要与印度解决这一问题而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国又单方面从该国至今仍有领土主张的地区（如达旺地区、藏南地区和锡金的部分地区）完全撤出呢。对印作战的决定是毛泽东主席与身边一群关系密切的人士商议之后秘密做出的。使毛泽东主席及中国领导层最为恼火的不是印度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与交换领土有关的一揽子建议，而是感到中国被孤立了。

美国和苏联看起来都支持印度，如果这种支持持续下去，那么印度可能会变成一个亚洲大国，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1962年的战争使印军饱受羞辱，而且还暴露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的支持少得可怜。中国在恰当的时间发起了攻击，此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古巴陷入了核僵局，两国之间的对立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刻。还有报道说，中国曾通过外交途径确定了美国在印度卷入冲突时不会为其提供帮助。

上述例子说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战略体系（冷战）在把战争强加给南亚国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冷战还从深度和广度上扩大了印巴之间的分歧，导致克什米尔冲突变得棘手起来。在能源丰富的中亚和西亚地区，把巴基斯坦塑造成反共穆斯林壁垒用来对抗苏联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对美国来说，在克什米尔地区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只是付出了相对较小的代价，美国愿意这么做。美国军方领导人也对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以令其满意的方式解决之后愿意派兵参与西方同盟体系在亚洲实施的行动充满了信心。在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同盟体系之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与巴基斯坦合作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冷战早期，美国对

中国实施遏制。达赖喇嘛逃往了印度，美国在西藏通过康巴藏人开展秘密反华战争，这导致了西藏问题的复杂化。这些事态发展导致“印度中国之间亲如兄弟般关系”的崩溃，并加剧了两国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争端。现在，不但是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现了竞争，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发生了转向，这可能会对中印关系造成影响，使两国之间的冲突加剧。

从战略层面说，世界秩序对南亚地区的冲突造成了直接影响；从意识形态层面和发展层面说，世界秩序为促进、加剧和维持南亚社会中的冲突创造了条件。全球化激发了全球发展进程并且为南亚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些机遇，但同时也扩大了不平衡、产生了贫困并使贫困持续、增强了消费主义、鼓励了权贵资本主义并加深了文化疏离，从而导致了发展的扭曲。这些发展进程中的扭曲为《世界银行冲突分析框架》（World Bank Conflict Analysis Framework）中确定的冲突创造了条件。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三大爆炸，即信息爆炸、认同爆炸和期许爆炸。南亚国家在国家管理和领导上都有严重的欠缺，其政治制度无法满足这三大爆炸的需要。在南亚国家，大的社会团体和边缘人群没有被政府有效管

控且得不到发展，一些大型开发项目（如水坝、采矿和深林砍伐等等）还导致了大量人口无家可归，这是南亚国家在国家管理上存在欠缺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近年来，在尼泊尔、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的民主化进程中，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在国家事务领导上的很多失败，而这些失败成为了爆发冲突的潜在原因。在斯里兰卡，即便泰米尔叛乱已被平息了3年之久，但当局仍未找到解决导致种族冲突的根源问题的方法。过度看重个人权力和团体（党派）权力是这些事件中领导失败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南亚国家各级政治组织对权力和影响力的争夺导致了冲突加剧并持续得不到解决。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对旁遮普（Punjab）极端锡克教徒宾德兰瓦里（Bindrawale）的政治利用；上世纪80年代末，斯里兰卡总统普利马达萨（Premadasa）与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密切来往使印度维和部队（Indian Peace Keeping Force）蒙羞；1996年到2001年期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Birendra）对毛派叛乱的支持，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南亚的国内冲突也源于其动荡且未完成的国家和民族建设进程。不稳定的社会状态和政治结构加剧了种族和宗派冲突。国家和民族在

形成过程中的认同问题和归属问题致使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剑拔弩张。巴基斯坦尚未得以解决的民族认同问题（旁遮普人对信德人、俾路支人和帕坦人的统治加深了这一问题）以及斯里兰卡在1959年无视泰米尔和穆斯林少数派群体的感受宣布本国是僧伽罗语佛教国家是这些国家内部激烈冲突的根源。在印度，过去6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在整合边缘社会群体上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现在，过去那些被忽视并遭受歧视的种姓和部族的积极活动给印度政府的能力及其政治进程带来了巨大压力。国家发展建设成果分配不平等以及社会群体的期许与所得之间的落差日益扩大也成为了冲突的助推剂。在尼泊尔，毛派分子的叛乱在边缘部族和地区性团体的参与下延续了10年之久（从1996年到2006年）。而现在，他们正在要求在“新尼泊尔”获得平等、体面的地位，致使制订宪法和国家制度建设等工作陷入了瘫痪。

南亚地区不正常且开放的国家边界以及种族和社会问题向邻国扩散致使某一国的国内冲突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国家，从而引发双边冲突。当某国有意识地利用邻国的国内冲突来谋求本国的战略利益和国内外政策利益时，冲突更容易向外蔓延。大部分南亚国家都曾利用过邻国的困境来谋求本国利益。印度对斯里

兰卡种族冲突以及孟加拉国建国的干涉、巴基斯坦对印度和阿富汗实施的跨境恐怖活动、尼泊尔对从不丹涌入境内的尼泊尔裔难民潮的不满等等都是南亚地区国内冲突演变成双边冲突和地区性冲突的著名例子。有些蔓延的冲突因被激怒国家对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政策剧变以及国际合作应对得到了解决。1987年，印度的政策从为泰米尔叛乱提供帮助转变为通过派遣印度维和部队打击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此举可视为国家政策剧变的代表性例子。从2010年开始，孟加拉国对印度东北部叛乱组织在其境内寻求支持和庇护的态度有了转变的迹象。还可以一提的是，印度与不丹（2003年）和缅甸（1995年）建立了可靠的合作，联合采取行动对付在印度东北部地区活动并在不丹和缅甸谋求庇护的叛乱组织。

冲突的影响

很明显，南亚地区的冲突对该地区的国家格局以及构成这些国家的社会阶层造成了影响。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冲突是殖民统治结束后南亚地区形成的国家所固有的，而这些固有的冲突也起到了重组南亚地区国家的作用。在此方面有3个显著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显然是克什米尔问题，这一问题至少暂时改变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目前，

我们还难以肯定地说出什米尔问题如何最终得到解决。但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依据1963年与中国达成的边界协定，巴基斯坦将其在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占有的一大块区域交给了中国。尽管这份协定为印巴在最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后就该地区的边界问题展开谈判留下了空间，但是如果日后整个克什米尔地区（包括巴基斯坦占有的部分）归属了印度，那么中国是否会将此前巴基斯坦移交的领土转交给印度呢？人们对此持怀疑态度。第二个例子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那就是1971年孟加拉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之后建国，美国、中国和联合国都卷入了这场冲突。第三个例子是锡金归属印度。锡金原本是英国的保护国，后来又成为了印度的保护国，由封建国王乔格亚尔（Chogyal）统治。后来，在锡金占多数的尼泊尔族人在伦达普·多吉领导下与国王乔格亚尔爆发了冲突。结果是，1975年4月锡金的封建统治者被废黜，结束了保护国状态，并成为了印度联邦的一部分。

冲突导致国家结构调整或重建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通过军事手段消灭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避免了一个分裂的泰米尔伊拉姆政权的形成，但是如果种族问题不能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的话，那么就

不能排除未来再次出现主张分裂的泰米尔政治团体的可能。印度东北部地区（尤其是在那加邦和克什米尔）持续不断的冲突都带有分离主义的“病毒”，尽管我们可以期望印度富有弹性的政策不会让这些问题爆发。在尼泊尔，如果特莱（Terai）地区不能通过联邦式架构和社会经济协调实现融合，那么尼泊尔人就会担心该地区从尼泊尔分离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不过，印度并不支持特莱地区分裂。面临着叛乱问题的俾路支省存在的分离主义情绪也在折磨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毗邻阿富汗的边境省份中的普什图人（Pashtu）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情绪。分析人员与政策制定者对巴基斯坦面临多种国内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有着激烈争论。正如一些分析人员所言，阿富汗存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可能会导致阿富汗这个国家以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重新界定。

除建立新国家和改变国家分界线之外，南亚地区的冲突还改变了一些国家的政权和政治制度。以下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1971年，巴基斯坦军队在印巴冲突中被印度军队击败，导致了自成立巴基斯坦以来的首个民选文官政权的产生。该政权由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Zulfikar Ali Bhutto）领导，干满了5年任期。1977年的大选后，巴基斯坦军方重新掌权，原因在于文官政权日趋弱化和巴基斯坦军方因俾路支省爆发冲突东山再起。2002年，尼泊尔的毛派叛乱促使国王贾南德拉（Gyanendra）阻挠了国家的民主治理进程，并在2005年掌握了政权。不过，由于尼泊尔毛派与主流政党携手合作，第二次人民起义在2006年4月取得了胜利，最终导致尼泊尔废除了君主政体（2008年）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在斯里兰卡，1982年宪法确立了国家政体为总统制，而种族冲突则是1982年修宪背后的驱动力。总统在任期内滥用职权导致了斯里兰卡总统制的扭曲，因此在斯里兰卡产生这样的争论：总统制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检讨和修订这一制度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即使斯里兰卡的制度和政权没有实质上的变动，但冲突还是使该国的管理部门发生了渐进式变化，特别是那些与社会治安、司法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部门。大部分南亚国家都在加强国家安全部门，包括军事、警察和情报部门。南亚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从某种程度上说斯里兰卡也是如此）正在逐渐显露出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特征。

冲突也给南亚国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社会暴力。南亚很多杰出的国

家领导人（如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和拉吉夫·甘地，斯里兰卡总统普利马达萨和杰出的部长拉提斯·阿索拉斯穆达里、加米尼·迪萨纳亚克、兰詹·维杰拉特纳、拉克什曼·卡迪尔加马尔以及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夫人）都死在刺客的枪口下或刺客制造的爆炸中。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在内战和恐怖袭击中丧生，妇女和儿童遭受了数不尽的暴力伤害。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造成了166人死亡和近270人重伤。如此广泛的暴力加上电视传播使南亚地区的居民在客厅和餐桌上就能看到暴力的血腥画面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残酷性。叛乱和冲突还导致南亚地区的儿童兵问题非常突出。南亚地区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和扩大了种族、社区和宗派断层，而基于认同的群体分化则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的分离和不稳定。

在南亚地区，冲突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有例子表明南亚地区的一些冲突被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而其他区域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停顿。比如，斯里兰卡的旅游业和服装制造业并没有在国内种族冲突的影响下丧失活力，人们常常会提到这个例子。与之类似，尽管要应对内部和外部冲突，但印度的经济仍然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例子并不具备太大的说服

力，因为与此同时，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经济在冲突的影响下变得非常脆弱。不管怎样，冲突增加了受影响国家的机会成本是不可否认。印度总理和其他领导人都曾公开承认，左派极端分子叛乱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随着叛乱的平息，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经济增长的前景变得光明起来。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国家间和平共处对保持增长和发展的势头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公认，阻碍各国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框架内成功进行地区合作的障碍就是印巴之间的冲突。鉴于印巴之间的贸易通道正在启动，地区贸易有望得到增长，这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是有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和地区竞争也阻碍了两国与阿富汗之间的双边合作，而如果两国与阿富汗之间的双边合作进展顺利的话，那么也将有助于印巴两国更好地打击国内叛乱。

南亚地区的冲突对该地区以及该地区国家的自治权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冲突导致南亚地区国家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涉和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是良性的有的则是破坏性的。印巴冲突导致南亚地区加入冷战使印巴两国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巴基斯坦一开始对与美国结盟非常热心，不过后

来又对与美国结盟产生了不满。考虑到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在巴基斯坦，美国的存在和影响已经成为了一项重大国家争议，尤其是在美国为杀死躲藏在巴基斯坦的本·拉登而开展情报行动之后。2000年，斯里兰卡邀请挪威作为协调国来推进其与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对话。不过，此举最后却受到了拉贾帕克萨(Rajapaksa)政府的批评并被该政府终止了。在南亚地区，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5到2006年分别介入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平叛行动到头来却饱受非议。在东道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印度在斯里兰卡的维和部队不得不打道回府，尽管其受领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

因此，我们发现，南亚地区的冲突造成后果多种多样且带有破坏性。这些后果影响到了该地区人民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比如安全、稳定、政治秩序、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南亚地区人民应该从这些冲突中汲取教训，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福祉投入到解决这些冲突的行动中来。

前景展望

人类生活在国家和社会之中，而冲突则是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在此方面，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概莫能外。本文所列举的引发南亚地

区冲突的原因（从历史原因到动荡的国家和民族建设进程再到畸形的发展态势）今后仍将存在。即便是一组冲突得到了解决，但另外一组冲突很快就会出现（可能会以转变后的形式或全新的形式出现）。

尽管各方都在努力落实建立信任的措施（CBMs），但印巴和中印之间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仍未得到解决。在印巴之间，克什米尔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巴基斯坦国内认同危机的蔓延以及军方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还产生了愈演愈烈的跨境恐怖主义等引发冲突的动因，这些对和平意愿的表达以及建立信任的措施来说都是釜底抽薪。再次发生孟买恐怖袭击那样的跨境恐怖袭击或者再次发生违反印巴控制线停火协议的事件都会引发人民的怒火和政治运动，从而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以及圣战极端分子在巴基斯坦的兴盛有可能会为这样的袭击创造条件。不过，总体来说，在未来几年，预计巴基斯坦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与阿富汗接壤的西北战线，并希望保持与印度接壤的东部战线的和平与稳定。

印度和中国都希望保持和平和稳定，以便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中国与日本和南中国海的邻国在领土上的纠纷不断加深，因此可能会与印度继续保持和平和理解。中国

的新领导人更加强调在南中国海的核心利益，南中国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尽管中国对保持印度战线的和平稳定有着内在需求，但看起来中国对解决与印度的边界问题缺乏准备，而且还在担心可能加强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会对其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产生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排除中国会以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为借口直接对印度采取行动或者通过鼓动巴基斯坦使印度疲于应付西部战线来间接扰乱印度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么微乎其微。我们在前文中就曾提到，印度在美国与前苏联之间搞战略平衡是促使中国在边境地区发动攻势的主要原因。

在可预见的将来，除印巴两国外，南亚地区可能不会再爆发国家间冲突。国内冲突蔓延和资源共享（共有河流、领海和扩展的海洋经济区、贸易和投资相关问题、移民等等）等其他一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但直接开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过，在可预见的将来，南亚国家的国内冲突似乎不会消失。印度的国内叛乱（克什米尔地区叛乱、东北部地区叛乱和左派极端主义叛乱）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印度在处理民族身份认同问题上很有弹性，在处理意识形态叛乱上也有成功的希望，但在一个国家

机构高度官僚化的、不够集中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协调国家行动并非易事。斯里兰卡的种族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依旧未见消失。在孟加拉国，世俗势力和宗派势力在战争罪犯审判问题上的两极分化逐步发展到了危险的边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斯兰极端主义冲突和宗派冲突可能会剧增。在尼泊尔，毛派分子中的分离派仍然对“人民战争”情有独钟。

南亚国家有效控制和 / 或解决这些国内冲突的能力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即实施民主的制度化以及确保经济以可观的速度增长并保证分配公平。目前，对大多是南亚国家来说，这两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战。例如，尼泊尔和马尔代夫到目前为止都尚未成功地将本世纪头十年出现的民主化浪潮制度化。尽管巴基斯坦人民党（Pakistan Peoples' Party）领导的民选文官政权干满了整个任期（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是第二次），但国家主要管理机构（如行政、军事和司法机构）的内部关系仍然非常紧张混乱。加强民主和发展经济将会增强南亚国家的力量，同时也会改善南亚地区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实现区域融合和合作的前景。

（刘雷译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工作论文第 170 号 2013 年 3 月 26 日，原文作者是穆尼）

澳大利亚战略规划浅析

廖凯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程序和相关机构设置，通过分析最近几年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改革和人员机构等设置，本文发现澳大利亚正在致力于推动一套系统的全政府一体化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划体系。而作为国家安全最重要的部分 – 国防战略规划体系已经相对完善。

关键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国防，战略规划

作者单位：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国家安全战略首先需要对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按优先级进行排列，并指导政府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投入。澳大利亚目前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官方指导性文件。因此《国防白皮书》、《反恐白皮书》等各部门发布的国家安全相关白皮书也就充当了国家安全规划的指导性文件。时任总理的陆克文在 2008 年的《国家安全陈述》则把国家安全定义为“免受攻击或攻击威胁；维持我们的领土完整；维持我的政治主权；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保持我们为所有澳大利亚人促进经济繁荣的基本能

力”。¹在这之前，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政策主要被认为是国防部的职责。甚至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全政府一体化的，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国家安全战略。澳大利亚在 2000 国防白皮书发布后，分别于 2003、2005 和 2007 年发布《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一个国防更新》来更新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和描述澳大利亚所处的安全环境的变化。从这些报告名称我们可以看出，国防政策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最主要构成因素。很多学者和专

家也对澳大利亚没有一个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质疑，并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提出了建议。² 本文将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程序

² 例如：Stephan Frühling, "Ghosts of Papers Past: The Strategic Basis Papers and Australi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Occasional Paper,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No 3 April 2012); NICHOLAS FLOYD, "How Defence Can Contribute to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gust 2009); Anthony Bergin and Mark Thomson, An Off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Making it happen,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 December 2007.

¹ Kevin Rudd, The First National Security Statement to the Parliament (04 December 2008).

和相关机构，以及国防战略规划体系进行简要介绍。

国家安全相关机构和政策制定过程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内阁作为最高决策层，负责最高决策的制定，但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决策几乎都由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内阁部长级的国家安全问题决策机构，主席由总理担任，副总理担任副主席，其他还包括6名常委，分别是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内阁秘书、总检察长、财政部长和移民公民部部长。委员包括总理与内阁府秘书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外交事务与通商部部长，移民公民部部长，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司令，国家安全顾问，国家评估办公室总干事，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主任，秘密情报局总干事。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点关注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国际安全问题，边境保护政策，和国家对正在形成的战略形势所做反映和情报界的各种活动。³

除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设有国家安全秘书委员会（敏物璠牡敦 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由总理与内阁府秘书长任主席，国家安全顾问任副主席。

³ Department of Defence, The Strategy Framework 2010, para. 2-15, 2-17.

主要职责是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和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国家安全相关政策的协调工作。同美国相比，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相对较低，属于总理与内阁府副秘书长级别。他主要负责国家安全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政策开发和给总理与内阁府秘书长及总理提供国家安全方面的建议，并且监督国家安全政策的实施。⁴ 国家安全办公室在2008年底收入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组（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Group）。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组由以下部门组成：“国际部；国土和边境安全部；防务；情报和研究协调部和国家安全首席信息官/网络政策协调员”。⁵ 它由国家安全顾问直接领导，主要负责协调国家安全相关部门和确保全政府一体化（whole-of-government）的国家安全政策。

每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为国家安全事务和国家情报事务制定优先次序。这项任务的协调工作主要由

⁴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Group Executive, http://www.dpmc.gov.au/national_security/index.cfm. [2012年6月18日访问].

⁵ Terry Moran,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Group”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16 May 2011), http://www.dpmc.gov.au/media/statement_2011_05_16.cfm. [2012年7月3日访问].

国家评估办公室负责。通过识别战略环境变化对以后3到5年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影响，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挑战全方位危险因素作一个“国家评估”。⁶ 以这份评估作为基础，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组将会对国家安全和国家情报进行优先权排序。国家安全顾问每年会根据这份国家安全优先权对各个国家安全相关部门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并对国家安全界的成就和不足作出总结。同时他还会对国家安全预算草案进行优先级排序，并给政府提供一份《国家安全预算备忘录》，⁷ 以协助总理和部长们在考虑预算草案的时候能对国家安全优先级和战略环境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总理会在作《国家安全陈述》的时候最终对国家安全利益进行阐述，对国家安全事务优先权进行排序。例如2008年的《国家安全陈述》提出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是：

保持澳大利亚的领土和边境完整。

促进澳大利亚的政治主权。

保护具有凝聚力和活力的澳大利亚社会和经济的长期优势。

在国内和国外保护好澳大利亚人的公民和利益。

推广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

⁶ 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⁷ Ibid.

国际环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推广有利于增强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⁸

如我们上面提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全方位的官方国家安全战略。但是各个国家安全相关部门会分别制定一些政策或战略。2000 年和 2009 年的国防白皮书也意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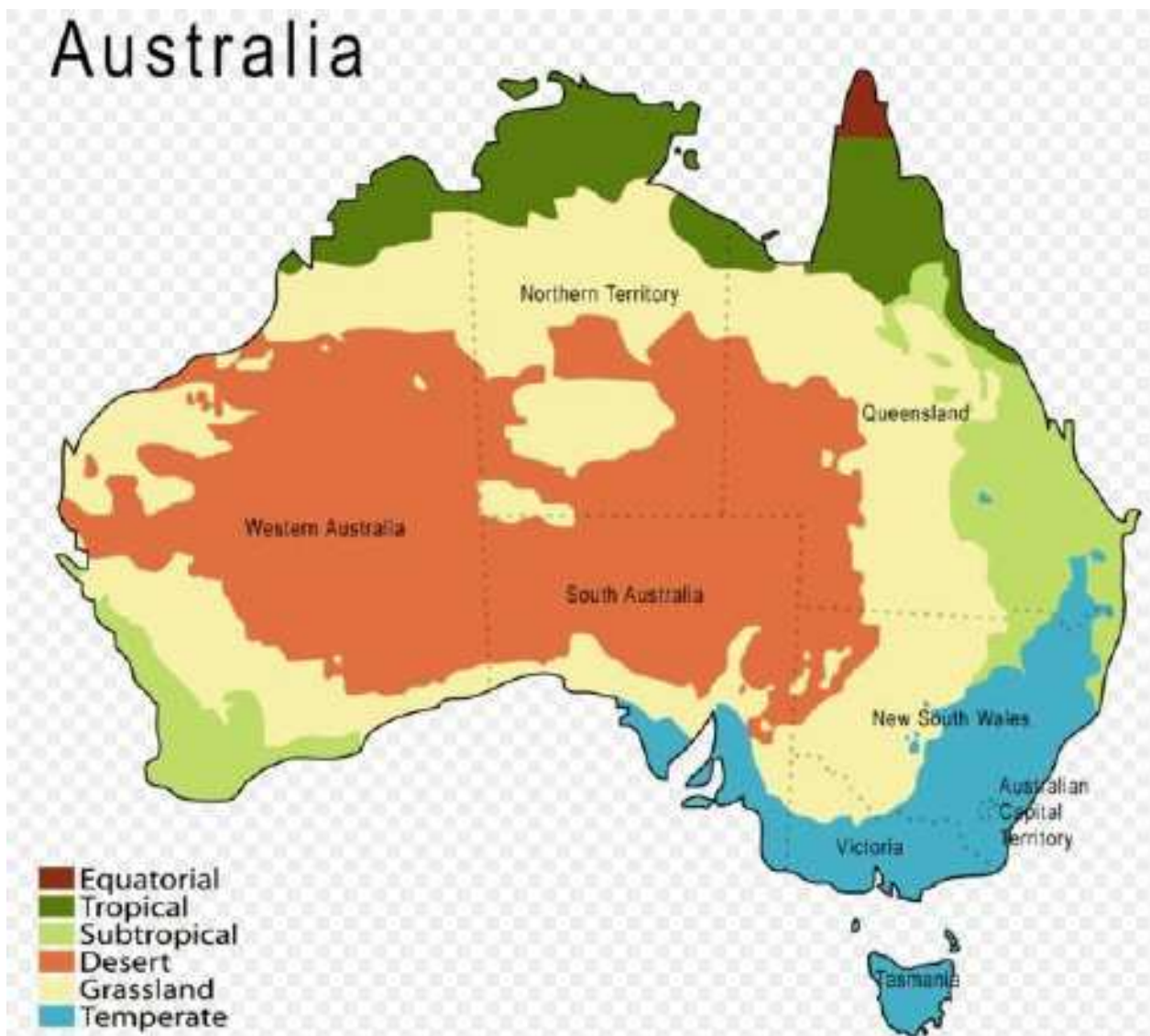
⁸ Kevin Rudd, The First National Security Statement to the Parliament (04 December 2008)

澳大利亚所处的战略环境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中国的崛起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等因素都远远超过了国防战略的范围。因此除了国防政策，澳大利亚需要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援助和军事政策的国家安全战略，以推动地区形势朝对澳大利亚有力的方向发展。⁹ 这些已经不仅限于传

⁹ Stephan Frühling, "Ghosts of Papers Past: The Strategic Basis Papers and Australian

统的国家治理和国防等方面，还包括其他一些新兴的威胁，例如“9.11”之后对反恐的重视程度大大提升。另外诸如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协助澳大利亚周边小国处理国家内部冲突、对外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包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Occasional Paper,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No 3 April 2012), 27.



澳大利亚地理图

括贩卖人口与军火和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包括网络犯罪和针对银行金融系统和飞行系统等在内的电子犯罪、水资源和供水系统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人口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长远国家安全的因素等都在《国家安全陈述》中多次提到。而因为这些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政府也意识到一个全政府一体化的方法越来越重要。因此，2008 年设立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职位也主要是为了协调国家安全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并且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开办了国家安全学院，为系统培养国家安全方面人才做准备。这一系列进展也说明澳大利亚政府正朝着一个系统化和一体化的国家安全战略发展，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份官方的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但是除了《国家安全陈述》这一指导性的国家安全文件，各部门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下制定了针对各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例如外交事务与通商部制定了《反恐白皮书》，国防部每五年内发布一份《国防白皮书》，另外还有《能源白皮书》，《国家能源安全评估》(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Assessment)，国土和边境安全评估检查报告(Report of the Review of Homeland and Border Security)，国家安全科学和创新战略，《针对人类流感的国

家行动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Human Influenza Pandemic)，《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政策》(Australia's Climate Change Policy)等。在有了国家安全顾问后，我们发现澳大利亚正朝着全政府一体化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方法改进，并且正致力于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开发。

国防战略规划

国防是国家安全战略最重要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国防白皮书》、《国防规划指导》、《季度战略回顾》、《国防军总司令规划指令》、《澳大利亚能力环境场景》、《澳大利亚军事条令基础》、《未来联合作战概念》和其他一些战略文件，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部门的国家安全相关白皮书等对国防规划和国防政策制定进行指导。¹⁰

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一般着眼于长远规划，因此不光分析当前，主要还会对澳大利亚所处的长远战略环境进行分析。例如 2009 年的白皮书就是对以后 20 年，一直到 2030 年的国防战略规划和指导。国防白皮书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指导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会碰头并讨论中心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战

略指导。¹¹ 政府不超过每五年制定一份新的国防白皮书，作为最重要的国防规划指导性文件。在制定国防白皮书前，国防部需要 a. 对战略风险进行评估，识别出战略环境的关键变化和国防部队主要任务的变化；b. 对军力结构进行检查，根据战略基本面和预算情况分析哪些新的主要项目可能被纳入《防务规划指导》；c. 开展一次独立的审计更新。¹² 而白皮书将会对澳大利亚政府对未来国防发展计划进行介绍，并阐述政府将如何实现这些计划。例如未来 20 年将会对哪些主要的军事能力进行投入，这些投入为什么必要，他们会对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民带来什么？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澳大利亚正致力于发展一套具有系统性和严肃性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划体系，而 2008 年新设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职务将以协调人的身份，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各部之间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进行协调以推动全政府一体化的国家安全规划系统。而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国防战略规划已经相对完善。

(全文完)

¹¹ Department of Defence, Force 2030, para 1.18.

¹² Department of Defence, The Strategy Framework 2010, para. 3-10.

¹⁰ Department of Defence, The Strategy Framework 2010, para. 3-7.

澳大利亚“陆地 400”装甲车换装计划的竞争者

[知远导读]

美国“陆军技术”网站近日发表了格兰特·特恩布尔的文章: Contenders vie for Australia's LAND 400 armoured vehicle programme。文章称, 澳大利亚的“陆地 400”项目将耗资百亿澳元, 采购高达 1100 辆先进的装甲车辆。几家国防巨头纷纷摩拳擦掌, 试图将这一合同收入囊中。文章详细介绍了几家竞争公司的情况, 同时也指出了该项目面临的挑战。

澳大利亚政府即将关于其雄心勃勃的“陆地 400” (Land 400) 项目做出决定, 该项目旨在更换陆军大部分现有装甲车辆。该项目的合同总值高达 100 亿澳元, 它是澳大利亚陆军迄今为止最昂贵、最复杂的装备采购计划。

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宣称, “陆地 400”项目在采购成本以及对陆军的作战能力影响方面, 是“最有效的赋能项目”之一。该项目旨在用超过 1000 辆先进的新型装甲车辆, 取代陆军超龄服役的 M113 型装

甲运兵车、澳大利亚轻型装甲车辆 (ASLAV) 和“大毒蛇” (Bushmaster) 防护机动车 (PMV)。

然而, 尽管“陆地 400”项目将耗费巨额资金, 而其决策可能会影响澳大利亚军队在未来冲突中的作用, 但是该项目除了防务界以外, 在澳洲以外很少受到关注。其他近期备受瞩目的项目, 例如,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和“柯林斯”级 (Collins-Class) 潜艇更换项目, 都受到了更加严格的审查, 澳大利亚政府正计划对“陆地 400”项目

进行同样的审查, 正如他在 F-35 战斗机以及新潜艇项目中所做的那样。

谁胜谁败?

对于澳大利亚国内汽车工业来说, 这是一笔巨额的资金, 对于澳洲汽车工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丰田汽车公司在 2 月宣布, 它将跟随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 (霍顿) 的步伐, 终止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汽车生产和经营, 从而有效地结束了该国的汽车工业。当丰田汽车公司在 2017 年全部关闭其汽车生



图1 超龄服役的“大毒蛇”防护机动车。

产线后，这将是澳洲自1925年以来首次出现没有国内汽车制造商的情况。

吉朗市(Geelong)位于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州——维多利亚州——是传统的制造业中心，它将深受到丰田汽车公司关门的影响，与此同时，邻近的澳大利亚南部其他地区也将感受到失业造成的痛苦。

对于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汽车业的失败代表传统制造业的空洞化。现在，制造业大约占澳大利亚经济总量的6%-7%，现在澳大利亚制造业的整体就业率甚至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目前，诸如吉朗市之类的地区面临着失业率上升和经济衰退的威胁，国防项目，例如“陆地400”项目有责任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振兴萎靡不振的商业制造业。这将与澳大利亚南部的技术港海军造船分局前进的路线类似。吉朗地区联盟(Geelong Region Alliance, G21)正在努力确保“陆地400”项目能够在澳大利亚生产，G21代表该地区政府、企业和社区组织的数量。

“‘陆地400’所需的多样化技能、高科技组件和制造业创新使其非常适合吉朗市和维多利亚州，这有助于该地区转型为一个全球性

的、高科技含量的规划、设计和制造名城，”吉朗地区联盟网站解释说。

国内生产的优势

鉴于以上原因，澳大利亚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在国内生产“陆地400”项目所需的装甲车，而不是进口。但是利用国内产能，哪家公司在“陆地400”项目的竞标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呢？三大汽车制造商谁会笑到最后呢？哪家公司拥有满足“陆地400”项目要求的车辆呢？

BAE系统公司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装甲车制造商之一，在“陆地

400”项目合同的竞标中是一个顶级的竞争者。该公司现有的几种车辆都有可能满足任务需求，其中包括：

- 美国陆军在伊拉克广泛使用的“布雷德利”战车 (Bradley Fighting Vehicle)；

- 瑞典武装部队列装的 90 式战斗车辆 (Combat Vehicle 90)；

- 南非武装部队装备的 RG41 型 8x8 轮式装甲战车；

- 英国陆军在伊拉克部署的“武士”战斗车辆 (Warrior Fighting Vehicle)；

- 美国陆军的下一代战车——地面战斗车辆 (Ground Combat

Vehicle, GCV)；

尽管 BAE 系统公司在澳大利亚制造陆基系统并没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业内专家已为该公司打上了领跑者的标记。

另一个主要的候选者是美国国防巨头通用动力公司。尽管与 BAE 系统公司相比，通用动力公司在澳大利亚占有的市场份额要小得多，但是它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业务站点，主要是为澳大利亚轻型装甲车辆提供终生维护和保障。这表明该公司拥有了一个成熟的能力基础，这在“陆地 400”项目的竞争中是非常有益的。通用动力公司还有其

他可考虑的轻型轮式装甲车最强阵容，其中包括：

- 美国陆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使用的“斯瑞克” (Stryker) 战车；

- “食人鱼”装甲车 (Piranha AV)，澳大利亚现有的澳大利亚轻型装甲车辆就是其改型车；

- 加入西班牙和奥地利军队服役的 ASCOD 型履带式步兵战车；

- 加入新西兰和加拿大军队服役的高负载轻型装甲车 (LAV High Capacity)；

尽管 BAE 系统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都拥有强大的装甲车产品组合，但是其他的竞争者包括法国泰利斯



图 2 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宣称，“陆地 400”项目是最有效的赋能项目。

公司和德国技术集团莱茵金属公司也非等闲之辈。近年来，这两家公司都积极参与了澳大利亚陆军的战车采购项目。目前，泰利斯公司在澳大利亚具备最广泛的装甲车设计和制造能力，他们正在从事陆军的“陆地 121 第 4 阶段”项目——“霍克死亡蛇”（Hawkei）战车项目。

莱茵金属公司同样曾在陆军的“陆地 121”项目中竞标成功，赢得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合同，在 2013 年为澳大利亚国防军提供 2500 辆军用卡车。该公司也拥有强大的装甲车选项，包括：多用途装甲车（AMPV）、“拳击手”（Boxer）步兵装甲输送车，“黄鼠狼”（Marder）步兵战车和“美洲狮”（Puma）装甲战车，所有这些战车最初都是为德国陆军开发的。“美洲狮”装甲战车曾经参与美国陆军的地面战斗车辆计划的竞标，但是输给了 BAE 系统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

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也作为系统集成商参与了“陆地 400”项目，并有可能与其他制造商联合投标。

前途未卜

当谈及更换其装甲车辆时，澳大利亚军方肯定不会孤单。一些国家也正在试图更换其老化的车队，美国的地面作战车辆项目是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今年早些时候，由于担心预算问题，五角大楼



图 3 BAE 系统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泰利斯公司、莱茵金属公司和波音公司是“陆地 400”项目主要的竞争者。

取消了该项目。2013 年 12 月，加拿大也取消了一个类似的计划，该计划准备耗资数十亿美元采购新的装甲车辆。

在北美地区，目前的趋势表明装甲车在国防开支方面的优先级别较低，尤其是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亚洲的再平衡专注于海上作战之时。这一趋势可能会影响“陆地 400”项目的未来以及 1100 辆战车的采购建议。最近的报告也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在为诸如“潜艇更换计划”之类的昂贵国防项目提供支持时捉襟见肘。

“陆地 400”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谁来建造这些车辆的问题，如

果最近这一趋势真的仍在继续，那么这些车辆是否能够建造才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澳大利亚国防工业界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至少目前澳大利亚政府还为“陆地 400”项目打开了绿灯。下一个步骤将是定于 2014 年中期的政府首次审议，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仍想继续这一项目。在此之后，需求方案说明书将会发放至相关企业。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确定哪家公司将赢得价值高达百亿澳元的项目。

（吴新建译自美国“陆军技术”网站 2014 年 5 月 7 日，原文作者是格兰特·特恩布尔）

守护和平之邦的文莱皇家武装部队

[知远导读]

印度《亚洲军事评论》2013 年第 12 期发表了阿瑟·戈登的文章：BRUNEI: Protecting The Abode of Peace。文章介绍了文莱皇家陆军、海军、空军的编制、装备情况，以及即将实施的武器采购计划。

文莱达鲁萨兰国的武装部队虽然规模可能很小，但是军种齐全。该国正在投入资金加强其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能力，使其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能够胜任各种人道主义任务。

文莱，全名文莱达鲁萨兰国，在马来语中，“Negara Brunei Darussalam”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和平之邦”的意思，位于婆罗洲西北海岸。文莱是一个很小的东南亚国家，国土面积 5765 平方千米（2,226 平方英里），人口 41.2 万。马来西

亚的沙劳越（Sarawak）州不仅围绕着文莱，而且也将其划分为两半。文莱东部的淡布隆（Temburong）区，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3%，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西部地区。文莱的官方语言为马来语，马来人占人口总数的 67%。

文莱达鲁萨兰国是一个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Hassanal Bolkiah）统治的伊斯兰君主专制国家，因此该国又被称为文莱伊斯兰教君主国。文莱原来是英国的保护国，直到 1984 年才从英国获得完

全独立，然而，它一直与它的前殖民主保持着的的良好关系。尽管国家很小，但是“和平之邦”非常富裕，这要归功于该国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所带来的收益占到了政府收入的 90%。它是东南亚地区第 4 大石油生产国，以及世界第 9 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主要分布在南部，海滨城市诗里亚（Seria）附近。文莱的内陆大部分覆盖着原始森林，双溪奕河是国内水上运输的主要通道。

文莱皇家武装部队 (RBAF)

文莱皇家武装部队成立于1961年，当时文莱仍然是英国的保护国。只有文莱的马来族人才能参加这支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武装部队。阿米努丁·伊赫桑(Aminuddin Ihsan)少将担任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司令，皇家武装部队主要由4个部分构成：文莱皇家陆军(RBLF, 3,900人)；文莱皇家海军(750人)；文莱皇家空军(1,100人)；军事培训学院。文莱国防部制定了文莱皇家武装部队的4种职责：第一，防止外国势力直接或间接损害文莱的主权，预防国内的颠覆活动；第二，开展军事行动来对抗侵略、恐怖主义和叛乱；第三，协助警方和官方

机构维护社会治安；第四，作为政府的代表与驻地居民维持良好的关系。

文莱是幸运的，目前没有任何地区安全威胁，虽然潜在的挑战，例如跨国犯罪、海盗、走私人口和贩卖武器确实存在。文莱对于中国南海南沙群岛中的路易莎礁(Louisa Reef)保持主权诉求，这座岛屿也是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争夺的焦点。2003年，文莱海军的舰艇与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关于有争议海域的勘探开采权有过短暂的对峙。

东南亚定期受到自然灾害影响，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地震和海啸揭示出天灾如何突然降临以及军方必须如何合作应对。无

论是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造成的灾祸，都是国防部策划人员正致力应对的一种威胁。

文莱皇家陆军

文莱皇家陆军是国家人数最多的军种，一直承担反叛乱以及宪兵队任务。这支旅级规模的武装部队下辖第1营、第2营、第3营以及一个支助营，其总部设在文莱北部的Berakas要塞。第1营也驻扎在Berakas，第2营驻扎在临海的都东(Tutong)，2007年，第3营换防到海边的红土坎(Lumut)，支援营驻扎在Penanjong。

支援营下辖：装备了16台阿尔维斯(Alvis, 现在的BAE系统公司)生产的FV101“蝎”式轻型战车的装甲侦察中队；战斗工程兵中队；营部支援连。使用路虎“卫士”(Land Rover Defenders)和从马来西亚进口的HICOM汉达兰四轮驱动车执行战术运输任务。文莱唯一的其他装甲车辆是法国GIAT公司(现在的耐克斯泰尔公司, NEXTER)生产的四轮驱动VAB装甲运兵车(APC)。

现在对于部队紧急部署以及执行广谱任务有了更大的需求。现有3个步兵营具有有限的能力来完成此事，但他们的目标是在远距离动用一连实施这种任务。为此，胜任多种任务的士兵们将需要增强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通



信和先进的光电设备。

为了应对更广泛的任务，陆军需要升级装甲运兵车，文莱也已经提出引入一系列能够提供更多的火力的变型车，以取代“蝎”式战车。2011年，文莱表示有意向采购15辆印度尼西亚PT Pindad公司生产的“野牛”（Anoa）六轮驱动装甲运兵车，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计划似乎还在原地踏步。文莱皇家陆军需要改善其火力，105毫米（4英寸）轻型火炮可能是其首选装备。竞争者包括BAE系统公司的L118轻型火炮和耐克斯泰尔公司的LG1的Mk-2牵引式榴弹炮。

文莱皇家陆军计划将1个步兵营改编为机械化营，增加第4步兵营和炮兵营，组建第2工程兵中队（加上建立1个快速反应工程兵小组），组建1个可以提前收集海外部署信息的侦察排，以及将军用爆炸物处理（EOD）能力转换到工程兵中队。另一个短期目标是建立2间设备齐全的团救护所（Regimental Aid Posts, RAP），以供救灾行动中使用。

文莱皇家海军（RBN）

文莱在中国南海有一条长161千米（87海里）的海岸线。该国的主要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是文莱壳牌石油公司，拥有平均每天141,000桶的产能。文莱皇家海军不仅要保

护海上石油平台，同时也要保证石化产品出口的海上通道不会中断。作为一个小的沿海防御实体，后者显然超出了文莱皇家海军的能力，但尽管如此，文莱皇家海军也必须捍卫从海岸线一直延伸至200海里（370公里）距离的国家专属经济区，阻止外国侵略者来自海上的攻击、进行海上监视以及执行搜索和救援任务。文莱皇家海军的总部位于穆阿拉海军基地，尽管基地在2013年11月完成了升级，但是仍然较小，无法容纳大型来访船只。

文莱皇家海军有四个组成部分：作战舰队、行政部门、训练中心、后勤支援。海军一直寻求建立一系列分层的监视和响应能力。最外层需要3艘能够在专属经济区范围内运营的近海巡逻舰（OPV）。于此相对应，2011年，文莱委托德国吕尔森造船厂建造3艘“达鲁萨兰”级（Darussalam）近海巡逻舰全部入役。这一造舰合同于2007年签署，该型近海巡逻舰长80米（262英尺），配备了1门BAE系统公司生产的57毫米（2英寸）舰炮以及4枚欧洲导弹集团生产的“飞鱼”MM40反舰导弹。它们的入役减轻3艘“瓦斯帕达级”（Waspada class）导弹巡逻艇的负担。第4艘1,625吨级近海巡逻舰有望在2014年加入舰队服役。“达鲁萨兰”级近海巡逻舰有一个船尾飞行甲板以及发射和回

收硬体充气艇（RHIB）的坡道。

在接下来的海上防御层，文莱皇家海军需要一个快速巡逻艇编队，用于保护海上设施以及实施拦截。为了满足这一要求，4艘265吨级的“埃吉特哈德”（Ijtihad）级快速巡逻艇于2010年开始服役。这些快速巡逻艇还是由吕尔森造船厂建造，艇长41米（136英尺），装备了莱茵金属公司生产的MLG 27毫米（1英寸）轻型舰炮。这些快速巡逻艇拥有日夜监控的能力，并可运送登船小组。

建立这两层防御圈后，文莱皇家海军将需要采购在浅水河道运营的船舶。新加坡海威船舶工业（Marinteknik Shipbuilders）制造的25米（82英尺）长的快速拦截艇于2011年加入海军服役，预计还要建造2艘以上的同类快艇。各种辅助舰艇，例如，2艘“Serasa”级登陆艇和用于河网地区作战的15艘刚性快艇使舰队变的圆满。顺便说一下，河网地区作战的责任也被交给了军队。文莱也想要一个地表监视雷达以监测其海上门户，以及延伸截获跟踪、水下战和反水雷能力。

文莱从BAE系统公司订购了3艘1,940吨的F2000级近海巡逻舰，但是在2003年至2005年落成后，文莱皇家技术服务部门拒绝接收它们。文莱方面声称，这些近海巡逻

舰未能达到要求的规格，虽然这可能是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海军没有足够的人手操作它们。与BAE系统公司的激烈争执后，这些近海巡逻舰都被弃置在英格兰北部的巴鲁因佛奈斯，但它们现在已经加入印尼海军服役。

文莱皇家空军 (RBAF)

考虑到文莱很小的国土面积，勿庸置疑，文莱皇家空军规模也很小。文莱皇家空军通过以直升机为主的机群提供海洋领水和陆地边界的空中侦察、战术机动和空中补给。文莱皇家空军总部设在文莱国际机场内的锐姆吧(Rimba)空军基地，有4个部分组成：作战联队，后勤联队，训练联队，行政机构。作战联队包括4个飞行中队：第1中队装备9架贝尔212“喷射游骑兵”直升机和1架贝尔214ST中型

多用途运输直升机；第2中队装备6架德国制造的博尔科博105CB直升机；第4中队装备了4架西科斯基S-70A-5“黑鹰”中型多用途运输直升机；第5中队单独装备了一架印尼制造的IPTN CN-235M涡轮螺旋桨运输机。空军目前无法对区域部署的地面部队进行再补给，因为战略空运是通过与汶莱皇家航空的协议，在需要时使用其客机来完成。因此，文莱目前需要一架更大的运输机。2011年的国防白皮书也概述了固定翼海上巡逻机的要求，潜在的竞争者包括：法意合资生产的ATR 42双螺旋桨民航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军用CN-235-300和C-295运输机；豪客比奇公司生产的1900D双发涡轮螺旋桨客机；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生产的“冲锋-8”客机。新飞机将配备用于在专属经济区巡逻全天候昼夜监视传感器，

并可以重新配置运输部队。

贝尔212“喷射游骑兵”直升机和博尔科博105CB直升机机群的使用寿命已近尾声，文莱在2011年订购了12架西科斯基S-70I“黑鹰”直升机。预定机群中的第一架直升机在2013年11月抵达文莱，并被安排在2013年12月举行的文莱达鲁萨兰国国际防务展及研讨会议(Brunei-Darussalam International Defence Exhibition and Conference 2013)上进行飞行表演。S-70I“黑鹰”直升机将用于空中机动、战术空运、区域部署、监视和特种作战。文莱将加装光电套件，以提高其监控能力。2012年7月，一架贝尔212“喷射游骑兵”直升机坠毁，导致12名乘员遇难，这是文莱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航空事故，这次事故加快了文莱更换现有机群的步伐。

文莱的下一个选项可能是再订购10架以上的S-70I直升机。

文莱正在研究如何使用无人机(UAV)来改善海上和陆地监视。皇家空军航空团下辖的第33中队装备了BAE系统公司“长剑”短程地对空导弹(SAM)，第38中队装备的欧



S-70“黑鹰”直升机

洲导弹集团生产的“西北风”短程地对空导弹已经逾期升级。除了陆基和海基地对空导弹，文莱还需要一部移动防空雷达，因为目前只有民用雷达监视国家空域。

第3中队并入了训练联队，配备了2架贝尔206B“喷气突击队员”直升机和4架皮拉图斯PC-7的Mk2涡轮通用飞机。文莱曾研究购买BAE“鹰”式喷气教练机/轻型作战飞机，但这个计划已被推迟。然而，2011年7月最新的白皮书（见下文）表示，空中遮断战斗机已经列入其10-15年计划。

未来的方向

这份更新的国防白皮书，题为《保卫国家的主权：以更广阔的视野发挥作用》(Defending the Nation's Sovereignty: Expanding Roles In Wider Horizons)，通过国防白皮书可以看出，文莱准备提高其防御能力，并将以更加积极姿态为国际和平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未来的安全议程中，参与的行动经常包括多机构和/或由多国组成的，通信网络的高效运行至关重要。因此，文莱正在分两个阶段开发其指挥与控制(C2)架构。第一阶段涉及于2008年成立的联合作战中心(JOC)，这是文莱皇家武装部队的协调中心。2010年，诺斯

罗普·格鲁曼(英国)公司击败了13个竞争对手与文莱签订了合同，为其联合作战中心提供国际-联合作战指挥与控制系统(I-JOCCS)系统，该系统旨在确保文莱能够与东盟邻国实现互操作。第二阶段建立一个可部署联合作战中心。2008年，文莱斥资2500万美元从哈里斯公司(Harris Corporation)购买了大量的新型战术无线电台，包括RF-5800H背负式高频电台、RF-5800V甚高频手持式无线电台以及RF-7800单兵任务电台。

文莱皇家武装部队的军事人员被视为可以补充其他国家资源的人力资源。例如，2008年2月洪灾期间，军事人员与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的合作。在2011年的白皮书中，授权成立一种新的联合规划委员会(JPC)，目前似乎正在筹划之中。随着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文莱皇家武装部队专注于发展更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于是成立了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国防和战略研究研究所，以促进专业持续发展。

文莱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关系。定期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英国和美国举行演习，虽然训练一般是双边而不是多边的。文莱资金雄厚，英国通过轮换部署，将大约1000人的廓尔喀营永久驻扎在诗里亚。英国还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支持陆军航空队直

升机飞行和丛林战训练的学校。这些驻军是根据两国可更新五年防卫协议进驻的。新加坡也有一个用于丛林训练的永久性军营。在每年一度的合作水上战备和训练(CARAT)演习中，文莱皇家武装部队与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协同训练。2013年6月，文莱在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的主持下，举办了一次大型人道主义援助和赈灾(HADR)演习。

文莱热衷于发展本土的国防工业，其中一个目标是每两年举办一次文莱国际防务展。国防工业发展计划的目标是形成长期有效、可持续的防御能力，主要通过三方面入手：商业化，公司化和私有化；替代进口；经济改善计划。政府鼓励本地企业参与国防工业，然而，其规模在东盟最小，而且迄今为止主要从事维护、修理和大修。

文莱对于全球防务可能是一个轻量级选手。然而这个伊斯兰君主国越来越希望走出海岸线发挥自己的作用。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在这个新的前景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新的投资最终可能会帮助文莱表现出超越自己地位的实力。

(吴新建译自印度《亚洲军事评论》2013年第12期，原文作者是阿瑟·戈登)

土耳其强大的国防工业： 是北约的后起之秀还是不羁的盟友？

[知远导读]

美国“陆军技术”网站近日发表了格兰特·特恩布尔的文章：Turkey's formidable defence industry rising star or NATO's unruly ally?。文章称，土耳其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大力发展本土国防工业，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这一政策也导致土耳其与北约盟国之间发生了一些政治对抗，从而使其国防工业发展之路充满了挑战。

土耳其的国防工业正在蓬勃发展。武器出口量正在不断上升，武装部队中非土耳其制造的装备比例每年都在降低。土耳其正在建造自己的无人机、海军舰艇，甚至是主战坦克。但土耳其不断追求自给自足可能会影响他与北约以及外国供应商几十年的老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曾经说过：“自由和独立是我的天性。”几十年前的一句简单的话语，现在已经演变成一种哲学思想，深深地渗入了现代土耳其的政治和文化。任何行业都没有土耳其蓬勃发展的

国防工业能够更加真实的体现这一精神，该国领导人将自由和独立视作自己的国策。

在过去的十年里，土耳其已经

制定了专注于本土生产、开发国防装备的政策。当来自国外的国防装备在土耳其国内建造时，土耳其坚持不懈地寻求技术转让以及合作生



图1 土耳其正在建造自己的主战坦克。



图2 土耳其拥有强大的军用车辆生产工业。

产，从而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国防工业。

1974年的塞浦路斯武器禁运使土耳其军事采购的本土化政策变得更加清晰，总部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 EDAM)防扩散项目经理亚伦·斯坦因(Aaron Stein)说。1985年，随着土耳其国防工业局(Undersecretariat for the Defense Industry, SSM)建立，本土化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

本土装备和土耳其的骄傲

“土耳其的采购政策基本上依赖于合作生产协议和技术转让，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开始对其武器禁运，土耳其开始尽可能多的在国内生产武器装备。它是土耳其自豪的来源，他们对执行这一政策坚定不

移，”斯坦因解释说。

今天，土耳其的武器装备主要出口到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当然热衷于购买土耳其武器的国家还不止这些。2013年3月，国内领先的装甲车制造商奥托卡(Otokar)工业集团赢得了价值2460万美元的合同，为联合国提供装甲车辆。

今年年初，根据总部位于安卡拉的国防和航空航天工业出口商协会(Defense and Aerospace Industry Exporters' Association)提供的数据，土耳其2013年国防产品出口总额为14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10%。“虽然国家的整体出口在2013年原地踏步，但是国防和航空航天产品的出口出现了显著增长，”国防和航空航天工业出口商协会主席拉蒂夫·阿

拉尔·阿利斯(Latif Aral Alis)在一月份说。

随着国内国防工业逐渐增强，土耳其逐步停止了对美国、以色列和德国等国家的国防装备进口。2012年，土耳其采购的国防装备中，有60%为本土生产，而在2003年，本土装备的采购量只占全部采购量的25%。据土耳其国防工业局估计，土耳其现在直接从外国供应商进口的装备份额只占采购总量的10%。另外90%的装备是通过合作生产或者技术转让协议来获得。

2013年11月，国防部长伊斯梅特·耶尔马兹(Ismet Yilmaz)宣布，土耳其将投资60亿美元在土耳其首都以外的喀山建设一个新的国防工业基地，旨在促进创新和自给自足。

这种国防装备自给自足的野心迄今为止已经为土耳其催生了多项雄心勃勃的装备生产计划，包括：建造无人机(“安卡”，Anka)、新一级的护卫舰(“国家舰”，MILGEM)和双座教练机(“自由鸟”，Hurkus)。

强有力的象征——土耳其的主战坦克

土耳其在地面作战装备方面，显然已经能够自给自足。4家土耳其公司——奥托卡工业集团、FNSS防务系统公司、BMC公司和NUROL



图3 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MAK NA 公司——现在都拥有设计、开发、生产和测试装甲车辆的能力。其产品包括大型装甲运兵车以及步兵战车，例如，FNSS 公司生产的 PARS 8×8 步兵战车，还有防地雷反伏击战车，例如，BMC 公司生产的 KIRPI 防地雷反伏击车。

在所有项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土耳其开发和建造的、有史以来的首款主战坦克 (MBT)，坦克代号为“阿勒泰” (Altay)。

尽管许多西方国家都处于

降低坦克库存的过程之中，例如，英国已经将其“挑战者 II”型 (Challenger II) 主战坦克的采购数量减少到 200 辆；荷兰最近将其所有坦克出售给芬兰，但是土耳其却希望加强其武装部队，至少采购 1000 辆本土建造的坦克。

土耳其有大约 40 万常备军，已经配备了数量庞大的坦克，其中包括比较现代化的“豹-2” (Leopard 2) 和美国/以色列生产的 M60T 主战坦克。新的“阿勒泰”坦克旨在取代许多仍在服役的老旧坦克，例如，越战时期的 M48“巴顿” (Patton) 中型坦克。

作为地面作战的有力象征，“阿勒泰”主战坦克是土耳其的主打项目。随着主战坦克的加入，土耳其的官员宣称，国内工业已经能够满足土耳其陆军对于所有装甲车辆的需求。

“当考虑到主战坦克最复杂、全面的系统，以及我们在技术、战术和作战方面的成就，我可以自豪地说，土耳其现在已经能够建造土耳其陆军需要的所有装甲车辆，”国防工业局陆地平台部门负责人莱文特·泽内尔 (Levent Senel) 解释说。



图4 土耳其生产的 8×8 轮式武装突击车。



图 5 BMC 公司生产的 KIRPI 防地雷反伏击车。

“阿勒泰”本身就是土耳其与 K2“豹”式坦克的生产商——韩国现代罗特姆公司 (Hyundai Rotem) 之间的技术转让协议的产物。虽然韩国现代罗特姆公司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和援助，但是大部分部件和子系统都是由土耳其公司研发。

土耳其的艾斯兰系统公司 (Aselsan) 是生产电子系统的专业公司，负责设计和开发的子系统包括：火控系统、指挥控制通信信息系统。MKE 公司将负责生产 120 毫米主炮，Roketsan 公司将负责设计、开发和生产先进的装甲组件。

“该项目包括的很多重要子系统都是本地设计和开发，”泽内尔解释说。“这将确保土耳其国防工业获得新的技术和能力，并将显著

减少土耳其在这一领域的对外依存度。”

为“阿勒泰”提供动力——土耳其工业所面临的挑战

两辆“阿勒泰”原型坦克已经建成，另外两辆以上的原型坦克将于年底完成，预计批量生产将在未来两年内实现。

然而，尽管在过去十年本土建造能力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在坦克项目中并不都是利好消息。

为“阿勒泰”主战坦克提供动力已经被证明比原先的设想要复杂得多，同时也暴露了土耳其的自给自足模式存在的几个问题。目前“阿勒泰”原型通过德国制造的发动机提供动力，在量产车型中使用何种

发动机还没有最后确定。

土耳其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有一天将“阿勒泰”主战坦克出口到诸如阿塞拜疆和巴基斯坦之类的国家，但是严格的出口控制，意味着德国不太可能为量产型坦克提供引擎。与日本企业三菱重工的一个潜在的技术转让协议也因为日本的出口限制于 2014 年 2 月告吹。

“这样一个重要组件至今来源不明，意味着发动机将使该项目的未来充满风险，”泽内尔解释说。

国防工业采办局的主要目标是在土耳其国内生产发动机，从而摆脱外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所施加的限制。

“在我们的国防工业采办战略规划中，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关键子系统的替代来源，以降低该项目的风险，”泽内尔说。“所以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 (Defense Industry Executive Committee) 已经决定启动国家“动力包” (powerpacks) 计划，以降低由于外国政府的政策在未来变化所带来的不断上升的潜在风险。”

土耳其目光短浅的技术转让政策

土耳其积极寻求技术转让协议以及发展本土能力，已经导致与北约盟国之间发生了一些尴尬的政治对抗。

去年年底，土耳其政府选择了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为其提供价值 34 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China Precision Machinery Export-Import Corporation) 在竞争中击败了“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商雷神公司，以及意大利和法国财团欧洲防空导弹公司 (EUROSAM)。

许多人认为，中国以较低的价格为土耳其提供了最佳技术转让协议，从而使土耳其拥有了输出国产防空系统的潜力。但这些短期利益可能使土耳其的盟友，尤其是主要盟友美国付出长期成本，因此美国已经对这笔交易表示了担忧。美国外交官甚至暗示土耳其国防公司，如果他们与中国做交易将面临制裁。

“选择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主要是因为它有最好的合作生产协议，但仅贪图便宜的系统则太过目光短浅，”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不扩散项目经理亚伦·斯坦因说。“土耳其在输出导弹防御方面永远没有竞争力，但在国家的导弹防御方面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那么，当你可以选择一个北约互操作系统时，为什么会因为其他国家的系统而烧掉你与潜在供应商之间的桥梁呢？”

最近的报告表明，土耳其可能正在打算否决先前的决定，但

前提是必须有西方供应商愿意提供合作生产协议。“如果其他两家公司让我们在土耳其联合生产并进行技术转让，我们当然希望与北约盟国做这笔交易，”土耳其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 (Ahmet Davutoglu) 近日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说。

与中国的导弹交易以及装备本土化对土耳其国防工业提出的真正的挑战仍然存在。从长远来看，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导致一些波折。目前，动荡的国内政治局势困扰着土耳其，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面临着腐败指控。据称，

埃尔多安政府今年三月封锁了社交媒体网站 Twitter。

尽管土耳其的国防工业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挑战仍然持续存在。问题仍然是，土耳其是否可以从容应对这些挑战，特别是在如果他们冒险疏远美国和西欧盟友及其供应商的情况下。尽管如此，“阿勒泰”主战坦克之类的标志性项目明确展示出土耳其的意图，即在未来成为一个更大的国际防务市场参与者。

(吴新建译自美国“陆军技术”网站 2014 年 4 月 2 日，原文作者是格兰特·特恩布尔)



图 6 联合国维和人员装备的奥托克公司生产的“眼镜蛇”装甲运兵车。

位于中美两国利益交叉点上的泰国

[知远导读]

美国《空军》杂志 2013 年第 9 期刊登了理查德·哈洛伦的文章：Thailand's Pivot。文章主要介绍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国泰国为美国在东南亚作战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泰国近年来与中国的军事联系也越来越密。泰国之所以能够吸引美军的注意力，就是因为该国在地理上处于枢纽位置。而泰国也试图在中美两国的夹缝中找到中间地带。

尽管泰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但它长期以来是一个战略利己主义者。

美国空军和泰国的接触时间很长久，但有时也会碰到很多麻烦。从正面来看，泰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向美国作战飞机开放了很多空军基地，其中 7 个基地美国至今仍然可以使用。此外，曼谷是“金色眼镜蛇”和“天虎”年度军事演习的举办地，这些演习让美国空中、地面和海上力量在泰国与亚洲各国的同行们齐聚一堂。泰国也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两个条约盟国之一（另一个是菲律宾），而且泰国位于该地区的地理和政治中心，增加了它的战略重要性。

同时，泰国人也是出了名的善于左右逢源。

现在，泰国是中国在东南亚寻求影响力的主要目标——而且很明

显，曼谷乐于接受。在 6 月底，泰国皇家军队的指挥官塔纳萨·巴迪玛巴功上将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并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图 1. 在 1963 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共同保卫东南亚的国际同盟）会议开幕式上，法国总理乔治·让·蓬皮杜（右）正在发言，美国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左）、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和泰国外交部长塔纳·科曼在聆听。

是习近平，该委员会掌管中国军队）范长龙进行了会谈。

塔纳萨·巴迪玛巴功上将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房峰辉会面。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用外交辞令报道称，泰国和中国讨论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称，这包括“战略通信、人员交流和培训，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海上安全和多边安全”。

一位美国空军高级官员指出，尽管“亚洲的每个国家都同时与中国和美国保持关系”，但泰国可能是最主动寻求扩大与中国（特别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来往的国家。

2012年6月，无党派的国会研究处在华盛顿发布的报告指出，“泰国成为伙伴国的可靠性和成为地区领袖的能力是不确定的”。此外，该报告还称，当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底推出美国外交政策“再平衡”计划时，“美泰联盟之间的动作却明显滞后了”。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暗示称，美国对泰国在香格里拉对话（由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新加坡举办的防务官员与文职专家的年度峰会）期间的表现不满。在非正式会议期间，哈格尔会见了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盟国的高级官员，以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图2. 第561战术战斗机中队的一架F-105停在呵叻空军基地。



图3. 1972年，一架B-52执行完轰炸越南的任务后在泰国乌塔堡空军基地降落。

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伙伴国或潜在伙伴国的官员。但是很明显，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来自泰国。

美国驻泰国联合军事顾问团

除了“金色眼镜蛇”和“天虎”联合训练之外，泰国举办的与美国之间的其他军事演习达40余次。这些演习由美国驻泰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简称JUSMAGTHAI，该机构与

驻曼谷的美国大使馆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安排和监督。从效果上说，美国驻泰国联合军事顾问团是美国派驻在泰国皇家军队中的大使馆。

美国空军和海军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一条关键原则就是依赖盟国的军队、支援和财政支持，以及能够进入盟国的空军基地、海军港口和训练场地。因此，泰国在很多方面满足这些需要。



图 4. 在 2006 年的“天虎”演习期间，空军一等兵维克多·雷诺萨正在泰国呵叻空军基地等待一架 C-130 启动发动机。

美泰安全关系开始于 1950 年至 1953 年的朝鲜战争，当时曼谷也派出作战部队加入联合国军赴朝作战。在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漫长战斗中，泰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发起国之一。

肯尼迪总统于 1962 年向泰国部署军队，以阻止老挝境内的共产主义军队进入泰国东北部。在同一年，美国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和泰国外交部长塔纳·科曼发表了一份声明：美国承诺“保持泰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对美国利益非常重要”。自此之后，这份声明成为美泰军事关系的基础。

在越南战争期间，泰国向越南派出了军队，但更重要的是，泰国允许美国使用其空军基地，以便于美国起降 B-52、F-105 等飞机在南越和北越上空执行轰炸和攻击任务。B-52 的基地是乌塔堡泰国皇

家空军基地，它们参加的行动包括 1972 年 12 月的“后卫 II”战役。

在泰国其他地方，美国空军的战斗机以呵叻、塔克利和乌汶为基地；侦察机以乌隆为基地；特种作战部队位于那空帕依；战斗支援部队位于曼谷附近的廊曼。

吸引美国与泰国建立关系的部分原因在于泰国的地理位置。泰国位于中国南海沿岸，这里有当今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这里连接着太平洋和印度洋。美国海军通过这里在两个大洋间穿行，中国南海的商业交通比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加起来还繁忙。

作为一个条约盟国，泰国在中国南海沿岸为美国提供的重要优势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而且，泰国本身与中国不存在任何岛屿、岛礁或领海争端。

中国已经声明对中国南海的大

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北京已经清楚认识到它在中国南海的脆弱性，并将这里视为能够扼住中国大部分石油进口的咽喉之处。中国与东南亚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历史上多次占领越南的大片地区，并将其他国家（包括泰国）作为附庸国。大量中国人移居到泰国，并与中国保持着个人和政治联系。

越南战争结束后，泰国开始扩大与中国的军事联系。根据国会研究处（CRS）的研究，“曼谷追求与中国的战略重新定位，是为了遏制越南对其邻国柬埔寨的影响”。泰国在 1975 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联系，这比其他东南亚国家都要早。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报告称，曼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掀起了购买中国武器的热潮。泰国购买了舰对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护卫舰，火控雷达，500 辆坦克和 1260 辆装甲运兵车。但是由于 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泰国的军费开支迅速跌落，至今仍未恢复。但是，贸易和投资却迅速上升，其中很多是由泰国的华人进行的。

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发生 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泰国允许美国将乌塔堡等机场作为飞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中转站。泰国还派出一支由士兵和工程人员组成的队伍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位于喀布尔东北 25

英里处)修建了一条跑道。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为了帮助伊拉克重建,泰国还派出了450人的医疗和工程人员。在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后续灾害中,乌塔堡为美国在该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重要帮助。

但是美泰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这么愉快。

2006年,泰国军队发动了流血政变——这是泰国1932年宣布君主立宪制之后的第18次政变——罢黜了总理他信·西那瓦,宣布戒严。美国通过暂停对泰国价值2900万美元的援助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包括国防采购、职业军事教育和维

和行动训练。而泰国在2008年艰难地恢复了政治稳定之后,这些资金也恢复了。

泰国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名称是“金色眼镜蛇”,今年2月进行的是第32次演习,共13000人参加。“金色眼镜蛇”最初是美泰两国之间的双边军事演习,如今已升级成多国演习,尽管泰国曾经反对。第一个加入的是新加坡,随后其他国家陆续加入;在今年的演习中,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都派军队参加了。

观察员则来自20多个国家,包括缅甸(今年是缅甸第一次向“金色眼镜蛇”演习派出观察员)。中国

于2008年首次派出观察员。这些演习包括野外演习、指挥所演习和人道主义训练。

3月的“天虎”演习反映了美国驻太平洋空军部队要与泰国空军建立军事联系的愿望。来自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和韩国乌山空军基地的365名美国空军人员,与1500名泰国和新加坡空军人员一道,在呵叻和乌隆空军基地进行了为期10天的演习。他们联系了战斗机机动、空战战术、近距离空中支援和空投。

除了担心中国对泰国领导人的影响,用一位美国高级军官的话说,曼谷的政局是“脆弱的”,而这会影响到美国与泰国的关系。



图5. 在1996年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期间,泰国空军人员正在向美国空军人员展示可以吃的植物。今年举行的“金色眼镜蛇”演习是第32次了。



图 6. 在 2010 年的“天虎”演习期间，约翰·高纳军士长向外观望，而泰国皇家空军的士兵正准备从 C-17 上跳伞。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身体不好，美国担心泰国王位的继承。据说，玛哈·哇集拉隆功王子不受欢迎，因为他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前总理他信·西那瓦在政变中被废黜后就自我流放了，当时他的罪名是滥用权力，而他的妹妹英拉·西那瓦是现在的泰国总理。但是他信仍有数量众多的追随者，即所谓的“红衫军”。

他的反对者——“黄衫军”，决心阻止他返回泰国，或者把他投进监狱。他信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此前发生过暴力冲突，以后也可能爆发冲突。

悠久的历史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暹罗被军事独裁者控制，之后跟随日本，国名也从“暹罗”

变成了“泰国”。当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偷袭珍珠港之后，泰国对美国宣战，不过现在这件事已经被多数人忽略了。这是因为泰国试图重新夺回之前被英国和法国侵占的

领土。之后，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泰国放弃了它的日本盟友，而与美国达成协议，成为美国的盟友。

美国要想寻找美泰关系未来走向的线索的话，可以参考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塔林的著作，他是东南亚问题的权威。塔林曾指出，泰国倾向于寻求某种妥协，“当别无他途时，就跟着潮流走，这一政策背后有着悠久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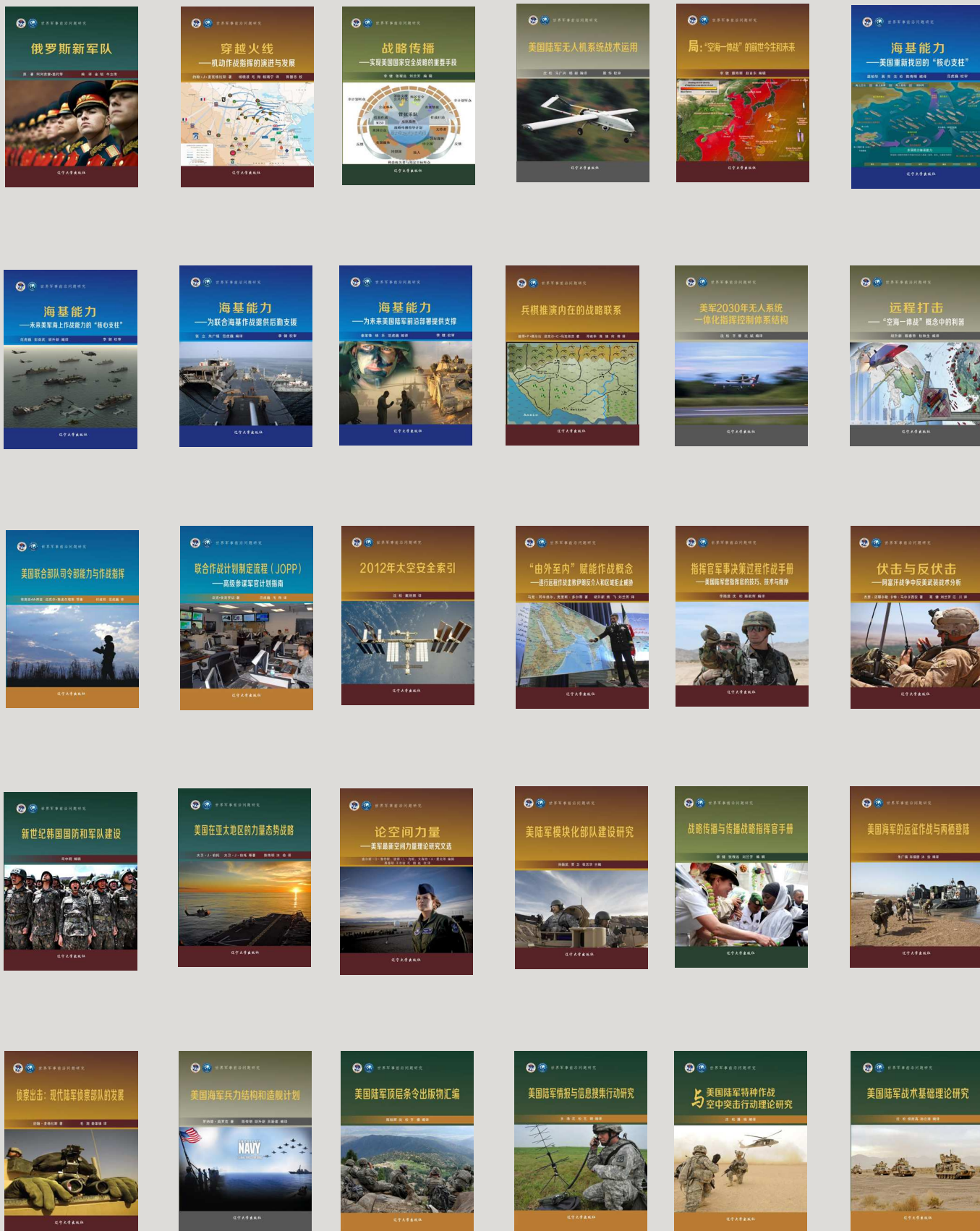
有迹象表明，在 21 世纪上半叶，在相互竞争的强国之间周旋的倾向将会继续。现在，泰国可能再一次试图找到美国 and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有利的中间地带。

（苏霍伊译自美国《空军》杂志 2013 年第 9 期，原文作者是理查德·哈洛伦）



图 7. 在新加坡的 2013 年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乐正在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瑞典、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交谈。

出版物书目



更多请访问 <http://www.knowfar.org.cn/html/book/>

APDQ

2014

No.04 (总第23期)

Asia & Pacific Defence Quarterly



亚太防务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